政治科學論叢 / 第 85 期 / 民國 109 年 9 月 / 頁 91-138

國家對外援助與企業對外投資之關聯：以日本的對外援助爲例*

邱奕宏**

摘　要

本文主旨在探討國家對外援助對其跨國企業從事海外投資的影響及其政治風險考量。本文以日本爲例，分析日本政府的對外援助是否影響日本企業的對外投資行爲。本文主張，作爲日本外交工具的對外援助將降低日本企業對受援國的政治風險顧慮，進而帶動日本對受援國的投資。此關聯凸顯日本對外援助政策政策與日本企業的互動關聯。本文檢視日本對外援助政策的發展，並以量化途徑檢視日本對外援助對日本企業向受援國投資及其在評估受援國之政治風險的影響。

關鍵詞：政府開發援助、外來直接投資、政治風險、跨國企業、對外援助

* DOI:10.6166/TJPS.202009_(85).0003
**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E-mail: chiouyihung@nctu.edu.tw。
收稿日期：109 年 5 月 4 日；通過日期：109 年 9 月 21 日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壹、緒論

日本從二戰後的百廢待舉，在短時間內於 1950 年代中期達成經濟復興，隨後進入經濟高速成長期，到 1968 年超越西德而成爲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就舉世聞名的東亞經濟奇蹟。此地位直到 2011 年方被中國超越而成爲全球第三大經濟體。

就對外投資而言，日本自 1950 年代後爲確保原物料及海外市場而開始向東南亞國家大舉投資，開啓以日本爲領頭雁，透過日本對外經貿的連結來帶領其他東亞國家，依照各國的比較利益來落實跨國產業分工的雁行理論（Flying Geese Model）（Kojima, 2000），進而使得日本在東南亞的投資於 1970 年代達到高峰。

其後，1985 年廣場協議（*Plaza Accord*）的簽訂導致日幣大幅升值，揭起日本企業海外投資的新風潮。當時日本企業向海外投資的標的轉向西方國家，美國的許多知名企業與房地產地標遂成爲日本企業收購的首要目標。日本企業大肆併購美國企業的舉措，如同近年的中國企業併購美國企業般，引發美國民眾的反彈及民族主義情緒，深怕美國會被日本以經濟方式侵略及佔領（Kester, 1993；Wile, 2014）。

然而，隨著 1990 年代初期日本泡沫經濟破滅，日本經濟遂陷入「失落二十年」（lost decades）的長期低迷。此期間雖歷經 2000 年代初期小泉純一郎時期的短暫復甦，但至今仍難恢復以往的榮景。儘管如此，日本企業在對外投資表現上仍是長年位居全球前五名的國家，並在 2011 年成爲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外資流出國，此地位直到 2016 年方被中國超越。[1] 由此可見，日本龐大的經濟能量與對外投資實力仍是不容小覷。

日本自二次大戰結束後，作爲亞洲「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代表，其以政府政策引導國家經濟發展的成功事蹟已成爲許多後進國家的典範。日本在政府與產業間的獨特政商合作關係，使得日本政府政策對民間企業具有他國無法比擬的影響，亦使得日本經濟奇蹟常被歸因於是在

[1] 這是以外資流量而言，資料來源爲 UNCTAD FDI dataset。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Japan, Inc. 的旗幟下，經由日本官僚與日本企業所建立的堅固聯盟，而一致團結對外從事經濟攻略的結果（Johnson, 1982）。

然而，日本的經濟成功卻無法掩蓋日本在安全保障及外交事務上長期依賴美國的事實，亦無法免除日本企業在戰後進行海外投資時必須背負二戰時殖民蹂躪其他國家的歷史印記。這使得日本企業在 1960-70 年代仍不時必須面對東南亞投資地主國的反日資風潮（小林英夫，1985；Ichimura, 1980）。面對作爲二戰戰敗國的政治限制，日本政府巧妙利用援外政策的「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作爲外交手段，以鞏固日本與其他國家的外交關係並藉以協助日本企業的海外擴張。

儘管日本企業與日本政府存在許多綿密互動，但不同於國有企業，這些企業仍是民間企業而不是聽命於政府官僚之行政命令的下級單位。特別是在涉及巨大金額的海外投資時，民間企業仍必須依循自身商業利益來做自主判斷，以決定是否向外投資及向哪一國投資。

換言之，日本企業在思考其對外投資時，如同其他國家的跨國企業般，亦會面臨許多來自投資地主國的風險與阻礙。學界大多將此類影響商業投資決策的「非經濟因素」稱爲「政治風險」（political risk）（Kennedy, 1987；Kobrin, 1979）。倘若國家希望透過鼓勵本國企業的對外投資來達成其特定的政治目的，則該國勢必會運用政策工具來增加企業向特定國家投資的意願、或經由降低企業投資這些國家的政治風險以達成其目的。

相反地，企業在選擇對外投資的地點時，除經濟因素考量外，倘若投資地主國與母國有較緊密友好的外交關係，企業會預期在該國將面臨較低的政治風險，而增加投資該國的意願。假使投資特定地主國能獲得母國的經濟援助，進而取得商業利益，則更將大幅增加企業投資的意願。因此，對跨國企業而言，援助國對受援國的經濟援助，除可能降低援助國企業在受援國面臨的政治風險外，亦將增加援助國企業前往受援國投資的經濟誘因與意願。

由此可見，日本政府的開發援助在日本企業海外拓展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特別是日本在戰後初期確立的「援助、貿易、投資的三位一體」之「開發援助」策略，更是彰顯其外援政策上的重商主義色彩（柯玉枝，2001；金熙德，2002）。1960 年代後日本對外援助金額逐年增加，在 1989 年超越

臺灣大學圖書館

美國成爲世界第一的援助大國（Akaha, 1991: 332；Katada, 2002: 320）。ODA 不僅是日本政府的重要外交手段，亦是有助於日本企業前往受援國進行投資與拓展市場的策略與途徑。就日本企業而言，ODA 不僅可以消極地降低日本企業在受援國投資的政治風險，並有積極帶動日本企業進行海外投資與擴大市場的正面效果。

簡言之，本文目的在探討國家的政府對外援助政策是否會影響其跨國企業的海外投資決策。經由對日本企業對外投資的量化分析，本文聚焦於日本政府的對外援助政策對日本企業在從事海外投資時，是否會影響其選擇投資地主國的決策判斷。因此，本文的研究問題是探討作爲日本援外工具的 ODA 是否會影響日本企業對受援國的政治風險評估，進而反映在其投資行爲上。

在章節安排上，本文緒論闡明研究意識、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第二節的文獻分析則從二次戰後的歷史發展，說明國家行爲是否影響企業的對外投資，再從文獻中歸納日本政府開發援助的意涵、發展與特徵。第三節提出本文的理論與假設，以闡明日本 ODA 與日本企業對外投資的理論關聯。第四節就前述的理論與假設進行實證分析。最後爲結論，說明本文的研究發現與政策意涵。

貳、文獻分析

首先，本節從國家對外援助政策與企業對外投資行爲，此兩者之關聯的相關文獻進行探討，以釐清兩者的互動與連結；其次，本節檢視與分析二戰後的日本政府對外援助政策的相關文獻，以闡明日本對外援助政策對日本企業海外投資的可能影響。

一、國家援助政策與企業海外投資的關聯

目前學界在國家對外政策與企業海外商業行爲兩者間的互動已有許多研究，對於國家外援政策（foreign aid）的相關研究更是汗牛充棟（Alesina & Dollar, 2000；Bueno de Mesquita & Smith, 2007；Knack, 2004；Remmer, 2004），但對於國家外援政策是否影響企業海外投資的研究則相對較少，因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爲此議題是涉及國際關係領域的外交政策議題與國際商業領域的企業對外投資決策的跨領域研究。爲說明兩者的互動關聯，本文首先從國際關係領域的角度闡釋國家對外政策與國際商業活動的關係，再說明作爲國家對外援助政策在二戰後的發展。

(一) 國家對外政策與國家間經貿關係的關聯

若從國家的對外政策與國家間經貿關係之關聯的既有文獻觀察，國關學界中的自由主義學派（liberalism）很早即提出跨國的商業活動會促進國家間和平的論點。這是因爲此學派認爲跨國商業活動將促進不同國家間人民的彼此溝通與理解，而國際衝突卻會破壞跨國商業活動及造成雙方損失。爲確保互利的跨國經濟交流，自然要減少負面影響的國際衝突。因此，該學派主張「商業的自然效果將導致和平」（Doyle, 1986；Hirschman, 1977）。

延續該學派思考而主張「民主和平論」（democratic peace theory）的學者，聲稱民主國家間不會發生戰爭的其中一個重要理由，即是因爲民主國家間彼此有著高度的經濟互賴而會促進民主國家間的和平。這亦是因爲發動軍事衝突將破壞民主國家間的經濟互賴，並將造成重大經濟損失，因而不被民主國家的民眾所樂見（Gartzke et al., 2001；Russett & Oneal, 2001）。依循相同的邏輯，外資作爲跨國經濟互賴的主要角色，許多研究亦指出國家間的外資互動有助於降低國際衝突的發生（Polachek et al., 2007；Rosecrance & Thompson, 2003）。

再者，在國際政治經濟學中主張現今國際社會各成員間存在「複雜相互依存」（complex interdependence）的學者，亦認爲國家間外交關係的緊密與否將會影響兩國間的經濟互動（Keohane & Nye, 2001）。換言之，國家間的政治關係會對其彼此的經濟互動產生影響。相關研究即發現，國家間外交關係的緊密程度將影響國家間的經濟互動；若兩國爲盟國、或簽訂各種雙邊經濟條約，則兩國會較有密切的貿易與投資的往來（Gowa, 1994；Long & Leeds, 2006；Oneal et al., 1996）。這些研究顯示，國家政治性的對外政策亦將會對民間企業的對外商業行爲產生引導作用。也即是，國家間外交關係的友好與否將會對兩國企業是否願意到對方國內投資產生影響。外交關係較緊密的兩國通常會較外交關係較緊張的兩國有更爲熱絡的外資互動。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另一方面，既有研究與諸多案例也指出，國家能利用其政策工具來鼓勵或遏止民間企業的對外商業行爲。就對外投資而言，許多文獻顯示國家可透過特定的政策工具（如經濟或金融政策）來鼓勵本國的跨國企業向特定國家（如盟國）投資，以達成國家所期待的戰略或政治目的，進以強化兩國的經濟聯繫，爲建立緊密的政治關係埋下基礎（Gilpin, 1975；Krasner, 1978）。

例如美國在二戰後利用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幫助西歐國家從事戰後的重建與復興。與此同時，美國政府亦透過優惠政策來鼓勵美國企業大舉向西歐國家投資，除藉此協助美國企業拓展海外市場及促進這些國家的民眾就業及經濟復甦外，亦透過扶助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以達成穩定政局與避免這些國家遭受到共黨的赤化（Gilpin, 1975）。

以國家政策來鼓勵民間企業投資海外的著名例子是美國在 1969 年成立的「海外私人投資公司」（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 OPIC）。該公司成立之目的在提供美國跨國企業在對外投資時所需要的政治風險保險（political risk insurance）。美國政府期望透過政治風險保險的提供，以降低其跨國企業在從事海外投資時可能面臨的政治風險，進以鼓勵這些企業從事海外投資及市場拓展（Busse & Hefeker, 2007；Mandel, 1984）。相同地，對外援助政策作爲國家對外政策的工具之一，亦自然可能會對本國企業向受援國投資與貿易產生正面鼓勵的作用。歸結而言，在國家對外政策與企業對外商業活動的連結上，國關學者大多抱持正面看法，認爲兩者間有緊密的互動關聯。

(二) 戰後對外援助政策的發展

作爲國家對外政策的一環，政府對外援助政策在二戰後開始蓬勃發展。當今國際間對外援助政策的開端可追溯在 1947 年由美國國務卿馬歇爾提出的「歐洲復興計畫」（又稱馬歇爾計畫）。該計畫在 1948 年至 1952 年期間對西歐國家提供高達約 132 億美元的援助資金。如前所述，促成美國提出該計畫的動機並非僅是單純的經濟因素，政治因素亦扮演重要的角色。該計畫除爲協助西歐各國重建因二戰而崩壞的經濟外，美國也希望透過此經濟援助來協助這些國家抵禦蘇聯與西歐共黨的政治威脅。由此可見，國家對外援助政策之目的與動機的多元與複雜，經常包含經濟、政治

臺灣大學國際關係研究圖

與戰略等因素的考量。

爲了運作馬歇爾計畫的資金，美國在 1948 年成立「歐洲經濟合作組織」（the Organiz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OEEC），以促進各受援國間的經濟合作與互賴，也藉此達成美國透由援助來遂行其建立常設機構以影響各國經濟政策的目的。面對美國對外援助政策的挑戰，蘇聯亦採取相對應的援助政策來協助其盟國。另外，在冷戰期間美蘇兩大陣營爲爭奪不結盟的中立國家倒向己方，亦展開激烈的援助競爭，致使這些援助多成爲兩強對外國施加影響力的外交工具，而帶有強烈的戰略色彩。

此外，奠定當今國際援助體系的基礎是在以已開發國家爲主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成員下之「開發援助委員會」（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DAC）爲中心的政府開發援助。此組織的成形歸因於在 1959 年底由美、英、法及西德四國的領袖會談，決議成立一個新的國際援助組織來提振援助的效率。次年，西方國家在巴黎舉行大西洋經濟會議，決定在 OEEC 下成立「開發援助團」（Development Assistance Group, DAG），以美、英、法等共九國作爲主要援助國來提供援助資金，日本則在 1960 年參加 DAG。另外，在該會議上由於美國與加拿大決定加入歐洲經濟合作組織，因此，該會議決議在 1961 年正式將 OEEC 擴大成爲前述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之後「開發援助團」被納爲 OECD 的下屬機關，並將其改名爲「開發援助委員會」而擔負三項功能：(1) 處理有關開發援助議題的協議；(2) 訂定與援助相關的規則與標準；(3) 負責在援助過程中督促援助國的行動等（金熙德，2002：10）。自此確立了 DAC 作爲當今國際援助最主要的國際組織，並建立了以 ODA 爲主軸的國際援助體系。

根據 OECD 開發援助委員會（DAC）的最新資料，目前有三十個提供 ODA 的援助國（OECD, 2020a）。DAC 從 1961 年起開始紀錄流向開發中國家的 ODA，並特別專注於被界定爲是「政府開發援助」（ODA）的官方（official）與優惠（concessional）的援助。此外，DAC 在 1969 年首次界定 ODA，並持續對 ODA 的定義進行修正與界定，以確保該定義在各援助國間能維持一致（OECD, 2020b）。根據 DAC 的定義，ODA 係指資源流動（resource flows）到開發援助委員會所列之 ODA 受援國清單中的國家與

臺灣人口與國際關係資料庫

領域，及到多邊發展機構（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s），包含如下：

1. 由政府機構所提供，包括國家及地方政府，或由他們的行政機構所提供；
2. 含括下列各項的交易：
   (1) 以提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與福祉爲其主要目的之運作；
   (2) 以優惠爲本質（concessional in character）（如贈與（grants）與軟貸款（soft loans））及帶有至少 25% 的贈與要素（grant element, G. E.）（以 10% 的折扣率作計算）（OECD, 2020b）。

在當今的國際援助體系中，ODA 占據最重要的地位而有三項特點：首先、ODA 是由政府資金所構成；其次、ODA 提供優惠的條件；第三、ODA 援助反映援助國的政府政策。換言之，ODA 與一般由民間個人或企業出資，或以商業營利爲目的之民間貿易與投資全然不同。特別是在援助國所提供的政府對外援助之無償援助部分，往往具有濃厚的政治與戰略意涵（金熙德，2002：v）。本文探討的 ODA 係以日本官方定義爲準，如表 1 所示，是指在國際經濟合作中的政府間經濟合作類別之政府開發援助，主要是指涉雙邊援助，即是兩國間的 ODA。[2]

從下表可知，ODA 可分爲「雙邊援助」與由「多邊援助」兩部分構成。前者的「無償援助」包括技術合作（技術援助）與贈與（無償資金援助）；政府貸款則包含專案（project）借款、非專案借款（如商品借款）及債務延遲這三種形式。後者則是指透過參與多國或國際組織而進行的援助。

援助國透過 ODA 的對外經濟合作，事實上並非全然是基於施惠他國而不求回報的利他主義行爲，而是著眼於短期或長期之國家利益的理性計算。在此思考下，國家期待透過對外援助來增進本國與受援國的經濟關係，進而達到擴大海外出口市場、確保原物料及能源供給等經濟目的。援助國援助政策的外在經濟影響亦會外溢到該國私人企業的商業行爲上，而影響該國企業在對外投資地點上的選擇。

---

2 由於日本透過國際組織來向受援國援助的比例相對較少，因此本文主要探討的 ODA 是指兩國間的 ODA 援助，即表 1 中的雙邊援助。

臺灣人文及社會期刊資料庫

表 1　國際經濟合作的分類

<table>
<tr><td rowspan="10">國際經濟合作</td><td rowspan="7">政府間經濟合作（Official Flow）</td><td rowspan="5">政府開發援助（ODA）</td><td rowspan="4">雙邊援助</td><td rowspan="2">無償</td><td>技術合作</td></tr>
<tr><td>贈與（無償資金援助）</td></tr>
<tr><td colspan="2">貸款（有償資金援助）</td></tr>
<tr><td colspan="2">其他</td></tr>
<tr><td colspan="3">多邊援助</td></tr>
<tr><td rowspan="3">其他政府資金（OOF）</td><td colspan="3">出口信貸</td></tr>
<tr><td colspan="3">直接投資的融資</td></tr>
<tr><td colspan="3">對國際組織的資助</td></tr>
<tr><td rowspan="4">民間經濟合作（Private Flow）</td><td rowspan="4">民間商業資金（PF）</td><td colspan="3">銀行貸款</td></tr>
<tr><td colspan="3">民間出口貸款</td></tr>
<tr><td colspan="3">對外直接投資</td></tr>
<tr><td colspan="3">向發展中國家及國際機構購買證券與債券</td></tr>
<tr><td colspan="5">對非政府組織的贈與（NGO Grants）</td></tr>
</table>

資料來源：筆者重新繪製（独立行政法人国際協力機構，2019：12）

金熙德歸納對外援助爲三種類型：第一種是以美國開啓的「戰略援助型」，強調以外交戰略的意識形態作爲對外援助的目標，以直接對外援助來達成其軍事及政治的目的。第二種是以日本爲主的「開發援助型」，分爲「中短期的期待」及「長期的期待」兩種。前者以擴大出口與確保資源供給作爲中短期對外經濟利益的目的，而利用援助來與自身國家經濟利益結合；後者則鎖定長期經濟利益，著重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第三種是「人道主義援助型」，以北歐國家提供的長期援助爲主。此種援助是以改善受援國的經濟社會條件作爲援助的動機，而並非透過援助來追求援助國自身特定的對外經濟利益、或是政治、經濟條件之目的（金熙德，2002：59）。日本的對外援助政策從早期以開發援助爲主，而逐漸轉向戰略援助及人道援助的方向。

(三) 對外援助與對外投資的關聯

學界對於對外援助與對外投資的關聯之研究主要集中在發展經濟學領域。經濟學者通常認爲外援與外資是補充國內儲蓄不足的替代，而有促進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效果。例如，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認爲，援助發展

臺灣人口與發展研究學會

中國家有助於他們改善投資環境與增加吸引外資（FDI）的能力（OECD, 2004）。

雖然發展經濟學家多認爲，ODA 可對發展中國家吸引外資的能力發揮正面積極的效果，但另一派學者則認爲外援對外資有排擠作用，而不利於海外民間資本流入發展中國家（Selaya & Sunesen, 2012）。因此，ODA 促進 FDI 的理論並未在既有實證研究中獲得普遍的證明（Clark, 1991；Harms & Lutz, 2003；Karakaplan et al., 2005；Kimura & Todo, 2010；Koyama, 2018；Koyama & Jen, 2015；Selaya & Sunesen, 2012）。目前有限的既有研究多以探究發展中國家所獲得的外援是否能促進外資流入，並多以發展中國家所獲得外援的總量作爲解釋其外資流入總量的解釋變項。這些研究多鎖定總數約 100 上下、接受外援的中低收入發展中國家。研究時間則長短不一，有從 1960 年到 2004 年（Karakaplan et al., 2005）、1980 年代至 1999 年（Harms & Lutz, 2003）、1992 年至 2002 年（Kimura & Todo, 2010）及 1996 年至 2013 年（Koyama & Jen, 2015）等不同期間。

此外，大多數研究企圖盡量納入多數發展中國家作爲統計樣本以探求外援與外資的普遍關聯，但仍有少數研究是針對個別援助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來分析此援助是否增加援助國對受援國的外資流入。例如，Kimura 與 Toda (2010) 探討全球五大援助國對受援國的援助是否增加受援國之外資流入，其結論與多數研究相同，外援並未顯著促進外資的增加。Koyama (2018) 比較日本與中國的外援是否促進受援國的外資流入，研究發現日本對受援國的援助與其對受援國的投資有正向的相關，但中國則未有相同現象。Blaise (2005；2009) 探討日本對中國及對東南亞各國的外援是否增加日本外資的流入，研究發現日本外援對日本企業對中國各省的投資及在東南亞的投資皆有正面影響。Hook 與 Zhang (1998) 在檢視 1986-1988 年及 1993-1995 年日本 ODA 政策的實證研究發現，接受日本 ODA 的受援國多爲與日本貿易與投資有較強連結的國家，因此認爲日本外援政策仍持續其重商主義的傳統。

上述說明顯示，多數既有研究多以外資與外援的普遍關聯作爲研究焦點，少數的比較研究或個案分析則並未深入探討援助國的外援政策特徵與該國企業之互動，更未從外援對跨國企業對外投資的政治風險之影響來思

臺灣大學國發所

考。爲彌補既有文獻之不足，本文將焦點鎖定在日本的對外援助政策對日本企業海外投資行爲及左右其投資決策思考的政治風險之影響。

二、戰後日本政府開發援助政策的發展

本小節簡述戰後日本對外援助的發展與理念，並闡釋其對外援助政策的內涵與特徵，最後分析其對外援助政策與日本企業的互動關聯。

(一) 日本對外援助的發展與理念

在日本於 1989 年成爲全球首屈一指的對外援助大國前，事實上，日本在二戰後曾接受來自美國與國際組織的大量援助而得以復興經濟。例如，在 1946 年至 1951 年間，日本從美國獲取總額超過 50 億美元的巨額援助（Fujisaki et al., 1996: 520）。

此後，世界銀行、美國輸出入銀行及民間銀行陸續提供給日本大量資金。從 1953 年到 1966 年的 14 年間，日本從世界銀行獲得總額約 8.6 億美元的融資，直到 1990 年 7 月日本方全部償還世界銀行的貸款（石原忠浩，1998：55；西垣昭等：2009：117）。因此，戰後日本的經濟復興可說是受惠於西方國家對外援助政策下的具體事例。

日本對外援助至今已超過六十餘年，許多學者各自有不同的分期（石原忠浩，1998；2015；吳佩殊，2006；柯玉枝，2000；2001；蔡東杰，2010；小浜裕久，2013；西垣昭等，2009；金熙德，2002；渡辺利夫，2007；Fujisaki et al., 1996）。大致而言，日本對外援助開啓於二戰結束後的 1950 年代至冷戰結束的 1991 年爲前一階段，冷戰結束後至今爲另一階段。日本對外援助的理念則依各時期不同而出現變化，以下闡述各時期的發展與理念：

首先是 1954 年至 1958 年的戰後賠償援助時期。日本對外援助的發軔起於 1951 年簽訂舊金山和約後，從 1954 年開始與受害國，例如緬甸、菲律賓、印尼及越南四國，達成戰後賠償協定及提供這些國家戰後賠償與無償援助。日本對外援助即以賠償形式展開（張隆義，1983）。此外，日本在 1954 年參加以提升南亞及東南亞人民生活水準的「可倫波計畫」（Colombo Plan），自此開始提供技術合作的相關援助給發展中國家，這是日本對外援助的第一階段。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次是 1958 年至 1970 年代初期的開發援助時期。日本自 1958 年開始提供「円借款」給發展中國家。此爲以日圓作爲計價單位的貸款，是促使發展中國家購買日本產品的「條件式援助」，進以達成增加日本產品外銷之「輸出振興」的目的。該期間也包含因應美國圍堵共黨勢力之要求而給予南韓及臺灣的「戰略性援助」（蔡東杰，2010：39）。再者，自 1960 年代後半日本開始利用円借款而展開對亞洲國家的外交，例如對印尼提供 108 億日圓貸款，再陸續提供円借款給東南亞國家，進以強化與各國的雙邊關係。

此兩時期的日本對外援助是以「開發援助」作爲核心理念，並以「服務於出口與對外投資」（輸出と対外投資に奉仕する）爲目的，具有強烈重商主義色彩，凸顯日本利用對外援助來協助企業拓展海外市場的特點。

第三階段是自 1970 年代初期至 1978 年的經濟安全保障轉型期。受到兩次石油危機的衝擊，日本開始調整對外援助政策及擴大援助的範圍，並提高非洲、亞洲地區的援助，以確保能源供給國的多元化（石原忠浩，1998：56）。

在此階段，由於國內外環境的變化，日本對外援助的中心理念轉爲「戰略援助」。此時期日本對外援助之目的是希望藉由援外手段來確保其在對外經濟、政治、安全面向的各項利益。例如，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機後，保障能源穩定供給的「經濟安保」即成爲日本對外援助的重要理念（Long, 1999: 330）。

第四階段是從 1978 年後至冷戰結束的總合安全保障之計畫倍增擴充期。日本外務省在 1978 年首度於「經濟協力現狀及展望（經濟協力白書）」上表示，日本將在三年內倍增 ODA 的金額。在此時期日本持續擴大援助金額，並首度在 1984 年超越法國成爲全球第二大援助國。1981 年日本首相鈴木善幸首度對總合安全的概念背書，誓言將強化對維持世界和平與穩定之重要地區的援助。1982 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提出日本作爲「政治大國」的理念，使得日本外援從經濟安全保障轉向而凸顯較爲強烈的戰略援助色彩（柯玉枝，2001：34；蔡東杰，2010：40；Akaha, 1991: 333；Brooks & Orr, 1985: 339）。

在此階段，日本對外援助的理念因受到國際社會對日本援助的期待增加，在大國外交的「外壓」壓力下，日本逐漸把「國際貢獻」納爲其援助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政策的重要理念。日本在 1980 年代開始積極追求政治大國的地位，其援助理念亦出現多元價值的現象。例如，1980 年代的日本外交白皮書（外交青書）與通產省的《經濟協力白書》都揭示日本 ODA 理念的三個面向：(1) 注重國際和平與繁榮的維持及對開發中國家的支援與國際責任的承擔；(2) 注重經濟安保、強化與開發中國家的經濟合作及確保資源與原料；(3) 強調人道主義及對開發中國家福祉與民生的貢獻（金熙德，2002：123-124）。

第五階段是後冷戰時期的 1992 年至 2002 年的政策與理念充實期。因冷戰結束的國際情勢變化，日本在 1992 年首度制定「政府開發援助大綱（ODA 大綱）」，載明「ODA 四原則」以展現其援助理念：(1) 兼顧環境與開發；(2) 迴避有助長國際紛爭的軍事用途；(3) 關注開發中國家的軍事支出、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與飛彈的開發、製造與武器的輸出入動向；(4) 促進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引入市場導向的經濟，及注意基本人權與自由的確保（石原忠浩，1998：55；Katada, 2002: 331）。

此四原則正式宣告日本外援政策脫離以往的經濟目的而朝向國際安全、民主化、人權及環保等多目的之戰略型援助。這也顯示日本對外援助理念從早期以經貿導向的「三位一體」，轉變爲以「政治援助爲中心」作爲核心理念，並首次將民主、人權與安全等因素納入 ODA 援助的原則，此凸顯其援助背後的政治價值（彭云，2009：101；金熙德，2002：100；Long, 1999）。此時期日本持續維持其全球最大援助國的地位，積極運用外援來達成其政治與戰略目的，並強調日本的國際貢獻與責任（柯玉枝，2001：36-37）。

第六階段是 2003 年至 2015 年的 ODA 大綱修訂時期。由於國內外情勢的變化，使得日本在 2003 年首度修訂 ODA 大綱，並確立 ODA 作爲確保日本安全、繁榮、促進和平建構、重視人類安全保障及增進國民廣泛參與的原則。此一方面是爲了納入國際發展的新途徑，另方面則是爲回應日本國內要求更透明及有效率的 ODA 政策，以藉此重振日本民眾對 ODA 的支持與理解（石原忠浩，2015：32；外務省，2015；Gilson, 2007: 38）。

在此階段的援助理念上，2003 年的 ODA 大綱修訂將諸如消除貧窮、和平建構及解決多元化全球問題納入 ODA 的目的，並提出良善治理對發展中國家自主努力之援助的重要原則，且首度以「人類安全保障」（人間の安全保障）作爲援助視角，強調對個人的保護及增進個人的利益與尊嚴（外

臺灣人學與國際關係研究資料庫

務省，2015）。這些價值反映日本援助政策理念隨著當時國際潮流而不斷更新（彭云，2009）。然而，此次修定將 ODA 政策與日本安全及繁榮的國家利益連結，亦凸顯日本欲藉此抵抗國內縮減 ODA 預算的政治壓力（Gilson, 2007: 38）。

最新的階段是從 2015 年迄今的「開發合作大綱」時期。2013 年安倍內閣首次制定「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在確定採取「國際協調主義」[3] 與「積極的和平主義」[4] 後，作爲經濟外交之手段的 ODA 面臨修訂的壓力。經一年審議後，安倍內閣在 2015 年通過名爲「開發合作大綱（開発協力大綱）」，取代原有 ODA 大綱。修訂後的大綱強調，開發合作的目的是爲促進世界人民與國際社會的和平、安定與繁榮，ODA 將扮演有助於發展的多種資金、活動及參與者合作的催化劑，進以達成前述目的。該大綱也點出包含促進非軍事合作、推進人類安全保障及支持自助努力的三項基本方針。簡言之，此次修訂凸顯日本企圖增進對外援助與外交安保戰略的連結（石原忠浩，2015：36；外務省，2020a）。

此時期的援助理念可從 2015 年的「開發合作大綱」得知日本試圖將援助政策納入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的一環。此改變除反映其濃厚的「戰略支持」援助色彩外，也凸顯其對當代全球議題的關注。更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5 年前，日本對外援助的大戰略大多是爲回應地緣戰略所作的政策調整，自 2015 年後則是爲回應地緣經濟的需求，這是因爲日本面臨到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及其亞洲基礎建設開發銀行的競爭。事實上，2015 年開發合作大綱中強調 ODA 將扮演有助於發展的多種資金之催化劑，即隱含日本政府試圖利用 ODA 來協助日本企業排除相關國家的市場障礙，並提供日本企業金融奧援，以協助其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下的中國企業競爭。

---

3 「國際協調主義」是日本國憲法所揭示的事項，也是日本外交奉行的原則，指日本在外交上不僅追求自身的國家利益，也致力於與其他國家友好合作，以求共存。

4 「積極的和平主義」是安倍晉三在 2013 年在外交及安保上所提出的政策主張，意指日本將要放棄以往以消極的態度來維繫和平的作法，而要改以更積極的作法來爲世界和平與安全承擔起責任。該政策期望日本在爲其自身安全與地區和平及穩定做出貢獻外，也要爲確保國際社會的和平、穩定及繁榮做出積極的貢獻。該主義包含下列三項方針：(1) 堅持日本作爲和平國家；(2) 持續做爲國際政治經濟的主要參與者；(3) 與包含美國在內的相關國家緊密合作（外務省，2016：4）。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總而言之，日本對外援助政策的理念從早期的開發援助、戰略援助、經濟安保、政治援助到現今的戰略支持，透露其外援理念隨著不同時期的日本國家戰略目標之變遷而更迭。

(二) 日本對外援助政策的內涵與特徵

以下依序說明日本對外援助政策的內涵及特徵。

1. 日本對外援助政策的內涵

日本對外援助政策的內涵可從其政策制定與執行機制及 ODA 的種類來說明。

(1) 日本對外援助政策的制定與執行機制

最初掌管日本對外援助政策的統一窗口是外務省，但主要負責規劃與執行 ODA 政策的機構是通產省通商局的「經濟協力課」，與居次的外務省經濟局。之後，外務省成立「經濟協力局」來統轄處理 ODA 業務。2008 年外務省經濟協力局與國際社會協力部合併爲「國際協力局」，而成爲掌管日本 ODA 政策的主要規劃、聯繫與執行單位。原通產省的 ODA 業務也移交給更名爲經產省的新設機構「貿易協力局」來管理（李世暉，2016：102）。

日本的 ODA 大致分爲無償贈與（無償資金協力，grant）、日圓貸款（有償資金協力，loan）及技術合作（技術協力，technology cooperation）三大類。早期 ODA 的無償贈與是由外務省負責，因爲這是由外務省的預算支付，而由外務省決定與實施。在技術合作上，因爲該類別約一半的預算是來自外務省及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JICA），因此該部分的項目則由外務省來決定而由國際協力機構實行。另外一半則來自各省廳的預算，因此由各省廳決定與實行。

占 ODA 大部分的日圓貸款援助（即有償資金協力、円借款）的預算則來自外務省、財務省、日本國際協力銀行（Japan Bank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JBIC）。在 1990 年代前，此日圓貸款的決定是由大藏省（現財務省）、外務省、通產省（現經產省）及經濟企劃廳的「四省廳」來協議及作成政策決定，即所謂的「四省廳體制」。這四省廳基於不同的政策角度來

臺灣人文與藝術期刊資料庫

審查 ODA 案件及作最後的援助決定，其決策方式採取「滿場一致型體制」，以求取各省廳間最大的共識。1990 年代後，因 ODA 大綱的制定與修正，ODA 援助項目的多元化發展促使日本對外援助政策的決策圈擴大，進而包含其他省廳（石原忠浩，1998；李世暉，2016：102；金熙德，2002：128-129；Hirata, 1998）。

ODA 的推動與執行，最早是由海外經濟協力基金（Overseas Economic Cooperation Fund, OECF）及日本國際協力機構來各自負責日圓有償貸款及無償資金贈與。1999 年後則改由日本國際協力銀行負責日圓有償貸款，其他項目則由日本國際協力機構負責（李世暉，2016：103）。爲因應國際情勢變化、日本國內行政改革風潮及提升 ODA 實施品質，2006 年日本國會通過「國際協力機構法」修改，採取 ODA 實施機構一元化，在 2008 年 10 月將原本隸屬不同單位的 ODA 相關業務，包含無償資金贈與、日圓貸款與技術合作全部移交日本國際協力機構統轄實施，使得該機構成爲實施日本 ODA 的單一機構（独立行政法人国際協力機構，2020a）。此外，首相、外務大臣、財務大臣、經產大臣及內閣官房長官則組成「海外經濟協力會議」，成爲制定 ODA 重要政策決定的機關（西垣昭等，2009：219-220）。

(2) 日本 ODA 的種類

當今掌管日本對外援助的國際協力機構將日本 ODA 的種類分爲下列六種，以下簡述各種類的內涵（独立行政法人国際協力機構，2019：13；2020b）：

a. 有償資金援助（即円借款）：提供低利息且長期償還的貸款來支援發展中國家的開發計畫，主要運用在基礎建設及需要大量資金的其他方案與計畫，可分爲計畫型貸款（Project-Type Loans）與非計畫貸款（Non-Project Loans）。
b. 無償資金援助（即贈與）：提供給低所得發展中國家無須償還的資金，以支持對社會經濟發展所需設施的基礎建設，如學校、醫院、水井、道路、採買設備與其他供應品。
c. 技術合作：透過利用日本的知識、經驗與技術來支持人類資源發展，以提倡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技術標準改善及行政體系的建立。利用在日本訓練的研修人員與派遣日本專家，進而協助發展中

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博士論文

國家解決問題的能力。

d. 國際緊急援助：當海外發生大規模災害時，在日本政府同意下，派遣日本國際緊急援助隊以回應受到影響的國家政府或國際組織之要求。此援助隊致力於救援事宜、醫療受傷病患、供給救援物資及協助災害的復原活動。

e. 公私部門夥伴關係：透過支持引薦日本企業的優異技術與產品與他們對計畫的參與，以協助發展中國家因應社會經濟議題的解決方案。這包含如對私部門投資金融，與鼓勵中小企業海外商業發展計畫之延伸支持。

f. 公民參與：透過不同方式與 NGO、地方政府、大學及其他參與國際合作活動之組織的合作，並派遣如日本海外合作自願者（Japan Overseas Cooperation Volunteers）進行公民參與合作。支持發展教育，特別是在學校教育領域，以深化發展中國家瞭解其所面臨的挑戰。

前述日本各種類型的 ODA 主要仍以前三項爲主。這三項中除日圓貸款外，無償資金援助及技術合作皆屬贈與。日圓貸款最早開始於 1958-1961 年間日本對印度提供 180 億日圓的貸款，來換取從日本進口鐵路、發電與送電設備。因爲這些貸款是以日圓計算而稱爲「円借款」。自 1965 年後，円借款即占日本政府對外援助的最大部分（金熙德，2002：67）。

戰後初期日本利用円借款來擴大海外投資、進行戰爭賠償及促進貿易出口。提供円借款的範圍最早是東南亞國家，之後廣及中南美洲、非洲及中亞等地區，並奠定日本成爲援助大國的基礎。早期日本多透過 ODA 計畫的綁約條件（tied タイド）來提振日本出口，以達到援助、投資、貿易三位一體的目的。但在 1978 年美日共同宣言中作出「日本政府決定對於資金援助時一般無綁約化的基本方針」的宣示後，此後簽訂的円借款協定即完全實施「無綁約化」（untied アンタイド）。自此，日本對外援助爲「提振出口而服務」的色彩逐漸淡薄，外援的無綁約率逐年增加，而致使日本企業參與円借款的計畫得標率逐年下降（金熙德，2002：78-80）。之後修改過的「海外經濟協力基金法」，無綁約的借款不僅適用於經濟開發資金，也適用於商品借款，這使得円借款的「綁約」規定不復存在，而讓受援國可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更大空間來運用貸款，但也壓抑日本企業在執行 ODA 的獨佔地位。

2. 日本對外援助的特徵

自 1950 年代以來，日本對外援助的整體特徵可分爲下列幾點：

首先，對外援助政策是日本從事經濟外交的主要手段。二戰後的日本外交，在戰略與安全上依賴美日同盟，發揮空間受限。在經濟外交上則以對外援助爲主軸，而成爲日本針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經濟外交的主要工具（李世暉，2016：98；金熙德，2002：51；Katada, 2002: 322-323）。

第二，日本對外援助多以經濟合作（經濟協力）來稱呼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援助。這是因爲經濟合作的涵蓋範圍較經濟援助更廣。其次是因爲經濟合作較有援助國與受援國平等合作的印象。此外，日本對外援助大多爲政府借款、民間貿易與投資的經濟合作，並非純粹的經濟援助。再者，日本認爲援助不應是施捨，而是應以促進受援國的經濟發展爲目標，因此稱爲經濟合作較爲合適。這也反映多年來日本 ODA 的援助比例（G.E.）向來是在 DAC 成員中最低的現象（石原忠浩，1998：58；金熙德，2002：46-47；Brooks & Orr, 1985: 325；Katada, 2002: 330）。

第三、日本的對外援助從早期透過援助以促進通商的重商主義，逐漸朝向以關照全球發展議題，與以受援國之關切作爲援助重心的多元化國際援助合作。此轉變使日本的對外援助朝向長期不求立即回報的人道援助方向邁進，彰顯日本作爲負責任大國的擔當與重視國際貢獻的轉變。

(三) 日本對外援助與日本企業的關聯

二戰後日本利用經濟合作的概念來達成戰後賠償與出口擴張的目的，並將此概念運用在日本對外援助上，融合對外援助與民間貿易投資，使得 ODA 政策成爲促進日本企業產品出口與協助日本企業前往發展中國家投資的政策工具。日本對外援助與日本企業向海外擴張的關聯有以下幾點：

首先，在戰爭賠償上，日本的賠償是以其商品或勞務取代現金。受償國政府需與日本民間企業簽訂直接物資供給的契約，而由日本政府對日本企業支付資金。換言之，日本政府透過支付戰爭賠償來促進日本出口、提升產業水平及攻佔亞洲市場（金熙德，2002：65-66）。

臺灣大學圖書館

其次，對於 ODA 中占最大部分的日圓貸款，通產省在 1958 年發行的經濟合作白皮書（The MITI's White Paper on Economic Cooperation）強調，對外援助是促進日本產品出口的政策工具，受援國需以取得的日圓貸款來購買日本產品。這是以提振出口爲目標的「條件式援助」（李世暉，2016：96）。因此，早期的日圓貸款多爲綁約型貸款，以促進日本企業對受援國的商品出口及市場佔領。

第三，日本對外援助是採取請求主義（要請主義）與計畫導向，即受援國必須向日本提出具體計畫以請求援助，且此具體計畫多是由在受援國營運的日本企業來擬訂計畫向受援國政府提出建議，再由受援國向日本政府申請。換言之，日本透過具綁約條件的日圓貸款援助、請求主義及計畫導向，來增進日本企業在受援國的商業發展，以推動日本的出口擴張及國內經濟成長（石原忠浩，1998：57；蔡東杰，2010：42；Arase, 1994: 177-178；Katada, 2002: 323）。

第四，從 ODA 決策與執行方式而言，日本與其他國家的 ODA 決策方式不同，ODA 的決策與執行結構中是制度性地納入日本企業，因此 ODA 與日本經貿目標的協調統合是自然的結果。即使後來綁約貸款援助的比例降低，日本 ODA 仍服務於日本企業在不同時期的發展目標。例如，早期 ODA 強調的出口擴張到 1980 年代中期後，遂被鼓勵日本製造業的海外直接投資所取代。因此，此種在組織內制度性包含企業角色的日本 ODA 決策與執行方式，有助於確保日本企業在 ODA 中的利益（Arase, 1994: 175）。

總之，早期日本的對外援助政策帶有強烈重商主義色彩，而使得外援政策肩負著促進日本企業對受援國貿易及投資的功能。但之後隨著日本對外援助政策的多元化、重商主義色彩的淡化，及有利於日本企業的綁約型日圓貸款比例逐漸降低，使得日本企業與 ODA 援助的聯繫不如以往。然而，由於日本經濟在 1990 年後陷入長期不振及受到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致使日本企業界呼籲日本政府應提高綁約貸款援助的比例，以增加日本企業在海外的競爭力。通產省亦建議應恢復承包商限於日本企業的綁約日圓貸款（蔡東杰，2010：45；Hirata, 1998: 321）。1990 年代日本在亞洲的 ODA 計畫開始增加基礎建設計畫、社會基礎建設與服務項目的 ODA 計畫之比例大幅上升、及在亞洲金融危機後綁約的對外金融援助與私部門參

臺灣大學圖書館授權使用

與逐漸變成 ODA 的政策基石，這些現象皆反映了日本企業的要求（Katada, 2002: 321, 328, 333）。

再者，此呼聲也反映在 2003 年 ODA 大綱的首次修改上。該修改後大綱強調確保日本的繁榮是對外援助之目的，並將原先的請求主義改爲較主動的「加強政策協商」。此改變除提升 ODA 的戰略價值外，也具有促進日本國家利益與經濟利益之目的（石原忠浩，2015：32；蔡東杰，2010：47）。由此可知，日本對外援助政策與日本企業之商業利益存在緊密的互動關聯。這也使得日本 ODA 是否具有促進日本企業對受援國投資的正面效果，成爲一個值得探究的課題。

參、理論建構與假設

本節分別說明理論建構與假設。前者從理論上闡述國家對外援助政策如何降低企業對投資地主國的政治風險考量；後者則根據該理論提出本文的假設，以檢視日本對外援助是否有助於日本企業降低對受援國的政治風險考量，進而產生促進對受援國投資的效果。

一、理論建構

本部分先闡釋政治風險的內涵，再說明爲何 ODA 應有助於本國企業向受援國投資。

(一) 政治風險

關於政治風險如何影響跨國企業的海外投資決定，既有文獻已有許多討論。簡言之，政治風險多是指涉因政治因素而對跨國企業營運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學界研究政治風險的高峰約是在 1950 年代到 1970 年代。當時正是二次戰後美國跨國企業大舉向海外拓展市場與進行跨國營運的黃金年代，也是許多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陸續脫離西方殖民地地位，開始追求其經濟獨立自主的時期。當時許多在第三世界營運的西方跨國企業逐漸面臨許多開發中國家利用國有化徵收或修改契約等方式，以爲本國爭取更大經濟利

臺灣大學圖書館

益的窘境。肇因於此時代背景，政治風險遂成爲當時國際商業學界的熱門研究議題（Kobrin, 1979；Simon, 1982）。

就政治風險的內涵而言，2011 年的世界銀行報告將其定義爲：「外來直接投資者所面臨，肇因於地主國或母國的政治力量或事件，或起因於國際環境的變化，而導致對於多國籍企業造成營運中斷的可能性（Multil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 2011: 21）。」

目前國際間有少數民間機構提供政治風險評估服務，以給予跨國企業作爲其進行投資決策時的參考。例如「政治風險服務集團」（Political Risk Service Group, PRS Group）及「商業環境風險情報」（Business Environment Risk Intelligence, BERI）皆以量化的指標提供各國的政治風險評估，讓跨國企業在選擇海外投資地點時有所參考（邱奕宏，2017：95）。PRS Group 提供的「國際間國家風險指引」（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 ICRG）含括政治、金融與經濟的三類風險。構成政治風險的項目如表 2 所列的各項。總和點數越高，代表該國的政治風險越低。

表 2　政治風險的項目與點數

編號	項目	點數
1	政府穩定	12
2	社經狀況	12
3	投資概況	12
4	國內衝突	12
5	外在衝突	12
6	腐敗	6
7	軍方的政治角色	6
8	宗教緊張	6
9	法律與秩序	6
10	族裔衝突	6
11	民主可責性	6
12	官僚品質	4
	總計	100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 Methodology,” (The PRS Group, 20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雖然地主國的政治風險對企業投資有實質的影響，但目前學界對企業如何評估此風險與此風險影響投資決策的比重仍未有定論（邱奕宏，2017: 97)。這是因爲從事對外投資的企業在企業規模、產業類別、投資策略等皆有不同，因此很難獲得一體適用的通則。這也使得企業對地主國的政治風險評估，除參考專業風險評估機構的意見外，亦可能受到母國對地主國的政策與其提供之資訊的影響，進而左右企業對潛在投資地主國的政治風險評估。

(二) ODA 有助於企業向被援助國進行海外投資

本文認爲作爲一國對外援助工具的 ODA 將有助於援助國企業降低對受援國的政治風險認知，而具有鼓勵援助國企業向受援國投資的正面效果。此正面效果在日本 ODA 與日本企業對受援國投資的關聯上更爲明顯，這是基於下列幾點：

1. 可信的訊號

普遍而言，本文認爲 ODA 代表援助國對受援國發出一項正面且可信的訊號（creditable signal），意謂受援國的條件已獲得援助國的審核同意，而使後者願意提供官方援助來協助該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此種官方訊號將對援助國的私部門企業產生正面而可信的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從而鼓勵援助國企業向受援國投資。這是由於下列幾點：

首先，除緊急災難援助外，其他種類的 ODA，無論是貸款、贈與或技術合作，皆象徵援助國與受援國在外交上較友好的關係、或關係的改善。這是因爲對受援國的援助計畫必須經援助國政府一定行政程序的審核通過後方能實施，若該援助計畫獲得通過，則意謂受援國的政治與社經條件能滿足援助國的標準。例如，對受援國提供貸款，則代表援助國認可受援國具有中長期還款的條件與能力；若對受援國提供的是贈與或技術合作，則意謂援助國認爲受援國具備戰略或政治重要性，而願意以無償援助來強化雙方關係。因此，對援助國的跨國企業而言，ODA 無疑代表援助國對受援國所發出的一項正面可信的訊號，代表援助國與受援國間較友善的外交關係，因而有助於援助國企業降低對受援國的政治風險疑慮。

臺灣大學國際合作與發展研究所

其次，ODA 通常意謂援助國與受援國間一項長期友好關係的承諾。一般來說，除短期的災害援助外，ODA 多爲中長期的社經計畫且需要長時間才能完成。這意謂援助國與受援國在援助計畫實施期間內必須保持密切合作、溝通與互動。再者，爲確保 ODA 計畫在受援國內的確實執行，援助國會有一套對 ODA 計畫的監督與考核機制。這意謂援助國 ODA 計畫的共同參與或考核人員必需常駐或定期前往受援國，以查核 ODA 計劃的進展。這也代表援助國與受援國間會有較與其他國家間更緊密且優先的雙邊外交關係，因爲援助國會關切其援助貸款是否被受援國有效利用，及其派遣之技術人員的人身安全。受援國亦希望能確保援助國滿意 ODA 計畫的實行，以使援助國能延續既有援助或給予新的援助。這些因素將使得援助國的跨國企業會在受援國中更易獲得保障。這一方面是因爲在受援國投資的跨國企業如遇到糾紛時將可更容易獲得來自援助國的官方協助；另一方面是因爲受援國爲維持與援助國的良好關係，而會對來自援助國的跨國企業投資給予更周全的保障。

上述兩點若反映在企業的政治風險考量上，則意謂援助國的跨國企業對受援國的投資不僅較能獲得受援國政府的保障，若一旦發生糾紛時亦較能獲得母國的協助。因此，跨國企業在有 ODA 援助關係的受援國中投資，其面臨的政治風險將比沒有援助關係的國家來得更低。受援國與援助國的不對稱權力關係，導致受援國會更重視保障援助國的跨國企業投資，而不會輕易毀棄其承諾。因此，對援助國的跨國企業而言，獲得 ODA 的受援國無疑代表母國背書的正面訊號，因而有助於跨國企業減少對此類受援國的政治風險顧慮，並產生鼓勵這些企業前往受援國投資的正面效果。

2. 先導效應（Vanguard Effect）

此外，另一項支持援助國的 ODA 會對鼓勵該國企業前往受援國投資的論點，則是由 Kimura 與 Todo 提出的「先導效應」主張（2010）。他們認爲援助國對受援國提供的 ODA 會對援助國的跨國公司產生先導效應，進而產生鼓勵援助國企業前往受援國投資的效果，但卻不會對其他國家對受援國的投資產生同樣效果。他們認爲導致此先導效應的原因有三項。

首先，由於援助國對受援國的 ODA 援助關係，使得援助國能獲得受援

臺灣人文與科技資料庫

國內商業環境的獨家資訊。此資訊將從援助國政府流通到該國企業界，而有助於援助國的企業較他國企業更能取得先機來取得受援國的商機。享受資訊不對稱優勢的援助國企業，自然較其他國家企業更可能前往受援國投資。

其次，他們認爲援助國政府提供的外援將降低該國企業對受援國主觀認定的投資風險。此點原因與前述的討論類似，即援助國與受援國間因 ODA 的關係，導致外交經貿關係的提升與強化，致使援助國的企業會在主觀上認爲前往受援國投資將有較小的風險。相較於其他國家企業，援助國的企業會對受援國的投資環境較具信心，而促使他們會較容易向受援國投資。

第三，他們主張對外援助將把援助國特定的商業運作、規範與制度等帶入受援國內，而產生促進投資的效果。例如，援助國向受援國提供的技術合作、貸款及贈與等形式的 ODA，不僅是將援助國的技術傳授給受援國、或是將貨品及勞務販售或贈與給受援國，亦是間接地確立和強化援助國與受援國間的長期商品、勞務及技術連結的長期合作關係。這是因爲在援助國與受援國間因 ODA 而流通的貨品、勞務及技術等皆會有後續的產品維修、零件供給、技術提升等隱含的長期商業關係。此連結將潛移默化地將援助國的商業運作、產品標準、市場規範或企業制度等帶入受援國中，而使受援國更易接受援助國的商品與企業運作，進而導致援助國企業在受援國市場中能較其他國家企業享有更多先占優勢（first-move advantage），因而更有助於吸引援助國企業前往受援國投資（Kimura & Todo, 2010: 483）。

3. 日本 ODA 政策的結構性有利因素

除前述兩項論點支持援助國對受援國的援助關係有助於前者企業對後者投資的主張外，如前所述，日本 ODA 政策與日本企業界間的綿密互動關係，更是爲日本 ODA 會促進日本企業向受援國投資的看法提供正面支持。

首先、日本 ODA 政策爲日本國家利益服務的目的始終如一，而促進日本經濟繁榮的商業利益，更是 ODA 政策視爲需優先達成的國家利益。

第二、日本 ODA 政策的決策與執行皆制度性嵌入日本企業的意見與利益。因此，ODA 計畫的擬訂與執行自然會結構性地有利於日本企業成爲受援國執行 ODA 計畫的承包廠商，此將增加日本企業向受援國投資的動機。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系統

第三，儘管日本 ODA 政策的重商主義色彩，從初期的公開（如綁約型貸款）而逐漸轉爲隱晦，但是其 ODA 是建基在援助國與受援國間的「經濟合作」，而非援助國對受援國所提供之單向援助的原則，則一直持續。換言之，日本期待從此經濟合作的援助關係中獲得利益。此利益取得的方式是透過較委婉間接的技術合作、人才育成或公私部門夥伴關係的援助計畫來達成。這些作法仍將致使日本企業在受援國中取得先占優勢，而促使日本企業更有意願前往受援國投資。

總之，本文認爲 ODA 援助不僅是援助國政府對受援國所發出的正面認可之綠燈訊號，亦是具有鼓勵援助國企業前往受援國投資的先導效應。加之日本 ODA 政策與日本企業間的緊密互動，更可能使得日本企業主觀上會降低對接受日本 ODA 援助之國家的政治風險在其對外投資決策上的重要性，進而促使日本企業更容易前往受援國投資。

二、假設

根據前述理論建構，本文提出下列假設：

〈假設一〉：日本 ODA 援助將促進日本企業前往受援國投資。

〈假設二〉：日本 ODA 援助將有助於降低日本企業對受援國之政治風險考量在其投資決策評估上的重要性。

〈假設一〉意謂日本對受援國的 ODA 援助與日本企業流入受援國的投資是正相關；〈假設二〉是指日本 ODA 援助將使得日本企業對受援國的政治風險考量變得較不顯著，因爲日本與受援國的經濟援助關係，導致日本企業覺得較爲安全而降低受援國之政治風險考量在其投資決策上的重要性。由於政治風險評估爲第三方的客觀評估指標，在理論上與實際上皆無法直接作爲 ODA 援助的應變項。但政治風險在日本企業的投資評估中是否爲重要因素，則可從納入 ODA 變項後來檢測的日本企業對受援國投資的模型中得知。

倘若在該模型中，在納入 ODA 變項且其他條件不變情況下，政治風險變項變得較不顯著或影響力下降，則我們可說 ODA 因素致使日本企業降低對受援國的政治風險考量。儘管既有研究對於於政治風險與外資流入的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響仍未有一致定論，但通常仍認爲有著較高政治風險的地主國將減少外資的流入。因此，本文認爲有較高政治風險的地主國(即政經環境較不安定的地主國)可能會阻卻日本外資的流入。但〈假設二〉所指稱日本 ODA 援助將可能降低日本企業對受援國之政治風險考量的重要性，是指該受援國的政治風險因素會因 ODA 援助而變得較不顯著及不重要，而不是指涉該政治風險因素實際上對日本企業向受援國的投資是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

肆、統計檢證與分析

以下簡要說明本文使用的變項、資料來源及模型，其次闡述統計分析結果的意涵。

一、資料來源、變項與模型

(一) 資料來源

日本 ODA 的統計資料是來自日本外務省網站的 ODA「國別開發合作實績」的統計檔案。該資料的涵蓋時間從 1969 年到 2017 年，包括全球 170 多個國家及地區，分爲贈與、技術合作及政府貸款三大項(外務省，2020b)。

日本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金額的資料則是從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取得。[5] 該資料涵蓋 1983 年至 2018 年的 32 個國家，但其中僅包含 20 個非已開發國家。再者，該資料對日本企業在 1994 年前於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投資紀錄付之闕如，因而大幅減少有效統計樣本的數量。由於前述兩項資料的侷限，使得本文最後納入統計分析的國家僅有 12 個，多爲亞洲國家。[6] 儘管此地域的侷限，但卻符合日本 ODA 捐助國家多以亞洲爲主的特色。

---

5 JERTO 提供兩項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資料，一是爲本文採用之國家數較少的淨投資流入（net and flow）的資料，另一則是國家數包含較廣但是基於報告與知會（reports and notification）且時間僅到 2004 年的投資資料。本文爲求準確性而決定採用前項資料（日本貿易振興機構，2020）。

6 此 12 個國家分別爲：巴西、中國、香港、印度、印尼、馬來西亞、墨西哥、菲律賓、新加坡、南非、泰國、越南。香港因不是國家，欠缺民主變項的 Polity IV 資料，而在最後統計分析時被排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政治風險的資料則來自政治風險服務集團的「政治風險評比指標」，涵蓋 1984 年至 2020 年、全球 146 個國家。其他的經濟數據則多來自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指標」（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WDI）資料庫，政治面向的指標則來自政體 4（Polity 4）資料庫。關於本文各變項的詳細資料，可參閱文末的資料附錄。

(二) 模型

檢證本研究假設的資料是合併的時間序列橫斷面（pooled time-series cross-section）的結構。本文的焦點是檢視日本 ODA 對日本企業外資流入不同受援國及跨越年份的影響。本研究資料包含的有效國家爲 11 國、涵蓋 23 年，由於本文主要關切在檢證假設，因此依循 Moundigbaye 等的建議（2017），採取 Beck 與 Katz 的追蹤資料校正標準差（panel-corrected standard error, PCSE）之最小平方分析（OLS）進行統計分析，以減少相關統計誤差（1995；2011）。此種以 OLS 的統計分析方式已廣被相關研究採用作爲檢測 ODA 對外資流入影響的統計方法（Kimura & Todo, 2010；Koyama, 2018；Tuman et al., 2001）。

爲控制理論與實際上的因果關係及減少因同時期而產生的內生性（endogeneity）問題，所有的解釋變項及控制變項皆延遲一年 (t-1)，以確認日本企業向援助國的投資行爲是在納入投資地主國的既有政經條件與日本 ODA 政策之後，所作出之投資決定的實踐。再者，由於跨國企業傾向延續對既已投資的地主國繼續投資，以維繫既有商業營運。因此，本文亦將日本企業前一年對地主國流入的外資納入控制。該模型可由以下方程式表達：

$$InFDI\ inflow_{i,t} = \beta 0 + \beta 1 lnFDI\ inflow_{i,t-1} + \beta 2\ IV_{i,t-1} + \beta 3 CV_{i,t-1} + \varepsilon_{i,t}$$

i 爲國家，t 爲年度，β 爲係數，ε 爲誤差值，IV 爲自變數，CV 爲控制變數

(三) 變項

本文假設的變項包含應變項、自變項及控制變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 應變項

日本對外直接投資是本文的應變項，該投資數據是從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取得。有些研究取此金額的自然對數（natural log）作爲變項，以壓縮因不同國家獲得援助金額差異太大而產生的偏差（Kimura & Todo, 2010）。其他研究因各自取向不同，有以短時間（3～5 年）的外資流入金額取自然對數的平均值（Koyama, 2018；Koyama & Jen, 2015）、有採用人均外資淨流入（net FDI inflow per capita）（Selaya & Sunesen, 2012）或其自然對數值（Koyama & Jen, 2015）、有採用以外資存量的對數值（log of FDI stock）（Harms & Lutz, 2003）、或外資流入占 GDP 比例（Karakaplan et al., 2005）等。爲減少國家間因外資流入金額差距過大而導致的統計偏差，本文取日本對外投資金額的對數值作爲應變項。

2. 自變項

自變項包括如下：

(1) 日本政府發展援助

從前述討論可知，日本 ODA 分爲三種：貸款、無償贈與及技術合作。這三種 ODA 的性質和內涵各有不同，對日本企業在地主國投資的影響也有差異。因此，本文以此三種 ODA 的個別金額與加總金額來分別作爲自變項，以檢視這些變項對日本企業在對外投資決策的影響。爲減少因各國獲得 ODA 金額之差異而產生的統計偏差，本文依循既有研究取 ODA 金額的自然對數作爲解釋變項（Kimura & Todo, 2010）。

(2) 政治風險

本文使用前述「政治風險服務集團」（PRS）中「國際間國家風險指引」的各國政治風險指標作爲政治風險變項的資料來源。該變項的評分是從 0 到 100，評分越高代表政治風險越低。換言之，該國在政治風險的評分越高代表該國越安全（The PRS Group, 2020）。因此，本文預期此變項應與外資流入的應變項是正相關的關聯，即政治風險評分較低的受援國會阻卻日本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資的流入，而政治風險評分較高的受援國會吸引較多的外資流入。

3. 控制變項

本文依照學界既有的外資理論及相關外資文獻，將影響跨國企業前往地主國投資的主要經濟因素與政治因素，納爲控制變項如下：

(1) 前一年外資流入：既有研究指出跨國企業的海外投資多有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的特徵，而會有對已投資之地主國繼續投資的傾向。因此本文依循既有研究，將前一年外資流入金額的對數值納入檢測中，以代表跨國企業多傾向對先前投資地主國進行再投資的特性（Jensen, 2003；2006）。

(2) 市場規模：投資地主國的市場規模通常會對跨國企業的投資決定有重要影響。既有研究指出，地主國的市場規模與外資流入有正面相關。地主國的市場規模大代表存在較多的商業機會，而會吸引較多跨國企業前往投資（Chakrabarti, 2001）。因此，本文以受援國的國內生產毛額對數值來代表市場規模（Blaise, 2005；Jensen, 2012）。此變項資料來自 WDI 資料庫。

(3) 經濟成長：地主國經濟成長的速度亦會對外資造成不同的影響。經濟快速成長的國家意味其經濟的產出與需求皆較經濟成長遲緩的國家來的強勁。經濟成長率高的國家自然較容易吸引跨國企業的進駐與外資的流入（Jones, 1996）。因此，本文沿襲其他既有研究，利用 WDI 資料庫的 GDP 年成長率來代表地主國的經濟成長（Biglaiser & Staats, 2010；Koyama, 2018）。

(4) 經濟發展：既有研究指出地主國的經濟發展程度亦對跨國企業的投資決定有重要影響。經濟發展程度代表地主國民眾的消費能力高低，而會影響不同型態的跨國企業前往投資的意願，因而經常被納入作爲外資流入的控制變項。既有研究有用人均 GDP（Selaya & Sunesen, 2012；Tuman et al., 2001）、或該值的自然對數來代表經濟發展（Harms & Lutz, 2003；Koyama & Jen, 2015）。本文運用 WDI 資料庫的人均 GDP（per capita GDP）的對數值來代表此一變項（Blaise, 2005；Biglaiser & Staats, 2010）。

臺灣人文與藝術期刊資料庫

(5) 經濟開放度：許多研究指出一國的國際貿易程度越高，代表該國阻礙國際經貿的障礙越少，而更容易吸引外資的流入。本文依循諸多既有研究，採取一國貿易量占該國 GDP 的比重來代表一國的經濟開放度（Biglaiser & Staats, 2010；Buthe & Milner, 2009；Harms & Lutz, 2003；Karakaplan et al., 2005；Koyama, 2018）。此資料來自 WDI 資料庫。

(6) 匯率：一國的匯率可能影響跨國企業對被投資國的投資意願，因此本文將此納入控制。本文以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的國際金融統計（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資料庫的該國貨幣對美元的該年平均匯率來代表此變項。

(7) 民主：既有研究指出較高民主程度的地主國與較多的外資流入呈現正相關，這是因爲民主制度對財產權有較佳的保障。民主政治有利於政治的穩定與商業信心的強化（Jensen, 2003；2008）。遵循相關既有研究（Tuman et al., 2001；Li, 2009），本文將地主國的政治制度因素納入考量，以「政體四」（Polity 4）資料庫的 Polity 2 變項作爲衡量地主國民主程度的指標，該變項從最不民主的 −10 分到最民主的 10 分（Marshall & Jaggers, 2005）。

二、統計檢證

本文使用 STATA 統計軟體，依前述假設模型進行 PCSE 的 OLS 迴歸分析，所得統計結果如表 3 所示：

首先，爲檢視在未納入 ODA 變項前，政治風險變項對日本外資流入的影響，本文在未含 ODA 變項的基線模型中獲得政治風險變項對外資流入具有 0.1 統計顯著性的負面影響。[7] 由於政治風險變項的評分越高，代

[7] 在表 3 中，基線模型內的政治風險變項對外資流入只有達 p=0.1 的負向統計顯著性，是因爲加入匯率此控制變項後的結果，在未加入匯率控制變項前（如附錄表 1），基線模型中的政治風險變項是 -0.0228 (.0109)**，達 p=0.05 統計顯著性的結果，且該政治風險變項在模型一、三、四、五皆有達 p=0.1 的統計顯著性，此結果顯示在加入 ODA 相關變項後，政治風險變項確實變得較不顯著，亦符合本文的假設（未加入匯率的統計結果，請參閱資料附錄表 1）。作者感謝審查委員的指教，雅納加入匯率做爲控制變

臺灣人文學社會科學引文資料庫

表地主國越安全及其政治風險越低。因此，這統計結果意謂有著較低政治風險的地主國（較高的政治風險評分）對日本企業的投資有負面影響；但較不穩定而有較高政治風險的地主國（較低的政治風險評分）卻較容易吸引日本企業向地主國投資。

此結果顯示，在未納入任何 ODA 變項前，日本企業似乎傾向對那些政治風險較高的受援國進行投資。此結果與既有一般印象認爲，有著較高政治風險的地主國多半會對外國企業的投資帶來負面影響的結論迥異。本文的統計結果反而顯示，日本企業有偏好向政治風險高的受援國進行投資的傾向，而受援國的高政治風險並非是阻卻日本企業向其投資的因素。

其次，模型一檢視日本 ODA 對受援國的貸款是否有帶動日本外資流入受援國的效果。模型一 A 結果顯示貸款變項對受援國的外資流入具有 0.05 統計顯著性的正面效果，在納入政治風險變項的模型一 B 後，貸款變項則變爲具有 0.1 統計顯著性的正面效果。此結果支持〈假設一〉，顯示即使在 1992 年日本進入 ODA 大綱時期後，日圓貸款仍對日本企業在受援國的投資具有正向的促進效果。然而，在納入政治風險變項的模型一 B 中，統計結果顯示政治風險變項對外資流入變成不具統計顯著性的負面影響，且相較於基線模型中的政治風險變項的影響與統計顯著性，模型一 B 的政治風險變項之影響降低，且變得不具統計顯著性。此結果顯示 ODA 貸款有助於降低援助國的政治風險在日本企業對外投資決策的考量比重，因而支持〈假設二〉。

模型二檢視日本 ODA 贈與對日本外資流入的影響。統計結果顯示，無論日本企業是否將政治風險納入考量，日本對受援國的 ODA 贈與對日本外資流入地主國皆具有統計顯著性的正面影響，顯示 ODA 贈與具有鼓

量的建議後，表 3 所呈現的統計結果，儘管顯著性變得稍弱，但是總體的趨勢是一致的，也就是政治風險變項確實是會因受到 ODA 變項的影響而降低其顯著性。再者，爲檢視基線模型中的政治風險變項對外資流入是否眞有統計顯著性的影響，筆者亦運用 STATA 的 xtreg 時間序列迴歸指令來檢證，在不含 ODA 變項的基線模型中，該政治風險變項是 0.01971(.0077)** 的 p=0.05 的統計顯著性，此結果與先前不含匯率變項而以 PCSE 方式運算的基線模型中之政治風險變項的統計顯著性相同。這些不同統計方式的結果皆顯示政治風險變項的確對外資流入有著一定程度的統計顯著性影響，而可對本文假設提供支持證據。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3　日本 ODA 與政治風險對日本企業對外投資之影響

變項 \ 模型	基線模型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A	B	A	B	A	B	A	B	A	B
外資 (t-1)	.5685*** (.0735)	.5222*** (.0993)	.5018*** (.0991)	.5110*** (.0869)	.5010*** (.0861)	.5606*** (.0751)	.5421*** (.0743)	.5539*** (.0770)	.5387*** (.0764)	.5342*** (.0798)	.5170*** (.0792)
貸款 (t-1)		.1311** (.0642)	.1209* (.0626)								
贈與 (t-1)				.1153** (.0587)	.1015* (.0592)						
技術合作 (t-1)					.	.1511*** (.0594)	.1447** (.0581)				
贈與＆技術合作 (t-1)								.1628** (.0675)	.1528** (.0662)		
ODA (t-1)										.1438** (.0625)	.1380** (.0625)
政治風險 (t-1)	-.0197* (.0117)		-.0188 (.0126)		-.0135 (.0122)		-.0180 (.0115)		-.0161 (.0115)		-.0177 (.0113)
經濟規模 (t-1)	.3249*** (.0912)	.3467*** (.1208)	.3140** (.1237)	.5478*** (.1170)	.5106*** (.1232)	.4289*** (.0933)	.3939*** (.0959)	.4464*** (.0973)	.4121*** (.1001)	.3497*** (.0841)	.3186*** (.0868)
經濟成長 (t-1)	.0543** (.0232)	.0595** (.0248)	0723** (.0288)	.0536** (.0234)	.0632** (.0274)	.0403* (.0216)	.0499** (.0236)	.0383* (.0218)	.0472** (.0239)	.0384* (.0216)	.0479** (.0236)
經濟發展 (t-1)	.1132 (.0978)	.3035** (.1321)	.3597*** (.1373)	.1707 (.0960)	.2056** (.1007)	.1199 (.0920)	.1812* (.0980)	.1403 (.0908)	.1916** (.0970)	.2761** (.1203)	.3302*** (.1240)
經濟開放度 (t-1)	.0037*** (.0012)	.0038* (.0022)	.0042* (.0022)	.0088*** (.0023)	.0088*** (.0022)	.0042*** (.0013)	.0045*** (.0013)	.0044*** (.0014)	.0047*** (.0014)	.0033*** (.0012)	.0037*** (.0012)
匯率 (t-1)	.0000 .00001	.0000 (8.66e-06)	8.22e-06 (.00001)	.0000 (8.59e-06)	.0000 (9.40e-06)	.0000 (9.30e-06)	5.64e-06 (.00001)	.0000 (9.25e-06)	8.16e-06 (.00001)	.0000 (9.11e-06)	7.14e-06 (.00001)
民主 (t-1)	-.0009 (.0092)	-.0005 (.0090)	-.0032 (.0095)	.0135 (.0087)	.0105 (.0089)	-.0053 (.0084)	-.0050 (.0093)	.0013 (.0086)	-.0018 (.0090)	-.0032 (.0097)	-.0066 (.0101)
常數	-5.0457 (1.8650)	-9.8809 (2.8517)	-8.1136 (3.1295)	-14.0887 (3.0503)	-12.4258 (3.3970)	-10.626 (2.3533)	-8.9103 (2.5756)	-11.3371 (2.5340)	-9.6842 (2.7427)	-9.7573 (2.1204)	-7.5554 (2.1076)
樣本數	230	187	187	210	210	230	230	229	229	230	230
R-square	0.62	0.62	0.62	0.64	0.64	0.63	0.63	0.62	0.63	0.63	0.63

註：括號內為標準差。P-values 以單尾檢定。*$p \leq .10$, **$p \leq .05$, ***$p \leq .01$。
資料來源：筆者依本研究結果製表

勵日本外資流入的正向效果，此結果支持〈假設一〉。但在納入政治風險變項的模型二 B 中，該政治風險變項與日本外資流入呈現負相關，但未具統計顯著性。相較於基線模型，此結果顯示日本 ODA 贈與仍有效地降低日本企業對地主國政治風險的考量，導致該變項變得不具統計顯著性。因此該結果支持〈假設二〉的主張。

模型三檢視日本 ODA 的技術合作是否有鼓勵日本外資流入的效果。統計結果顯示，在未納入政治風險變項前（模型三 A），技術合作變項對日本外資流入具有高度統計顯著性（0.01）的正面影響。在納入政治風險變項後（模型三 B），技術合作變項仍對日本外資流入有著 0.05 統計顯著性的正面影響。換言之，技術合作變項相較於 ODA 的貸款或贈與變項對日本企業在受援國的投資更具有顯著且更大影響力的正向鼓勵效應。此結果支持〈假設一〉的主張。就納入政治風險變項的模型三 B 而言，結果顯示該政治風險變項對外資流入是不具統計顯著性的負面效果。相較於在基線模型中具統計顯著性的政治風險變項，此結果顯示技術合作變項有效降低日本企業對受援國投資的政治風險考量，進而支持〈假設二〉的主張。

模型四是探究同爲無償性質的贈與和技術合作的總和，相較於貸款，對日本企業在受援國的投資上是否會產生不同的效果。統計結果顯示，無論是否納入政治風險變項，此無償性質的 ODA 對日本企業向受援國投資，具有統計顯著性的正面促進效果。換言之，無論是無償的 ODA（贈與和技術合作）或有償的 ODA（貸款）對日本企業向受援國投資的正面鼓勵效果並無顯著差異。此結果對〈假設一〉提供支持證據。就納入政治風險變項的模型四 B 而言，該政治風險變項對外資流入爲不具統計顯著性的負面影響，相較於基底模型的政治風險變項變得不顯著，此結果支持〈假設二〉之 ODA 降低日本企業對地主國投資之政治風險考量的主張。

模型五檢視包含貸款、贈與及技術合作三種 ODA 的援助總和金額，是否影響日本企業對援助國投資決策的思考。統計結果顯示，無論納入政治風險變項與否，此 ODA 總和對日本外資流入援助國皆具有 0.05 統計顯著性的正面影響。換言之，日本 ODA 援助對日本企業向受援國的投資釋出一項正面鼓勵的訊號，且對日本企業對受援國的投資具有實質的帶動效果。此結果亦支持〈假設一〉的主張。就納入政治風險變項的模型五 B 而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言，該政治風險變項呈現不具統計顯著性。相較於基線模型的政治風險變項，此結果顯示日本 ODA 援助有助於降低日本企業在對受援國投資時的政治風險思考，而使得政治風險變項變爲不顯著，因此該結果支持〈假設二〉的主張。

綜合前述，無論是否納入政治風險變項，各種形式的日本 ODA 皆對日本外資流入受援國具有統計顯著性的正面鼓勵效果，而尤以技術合作的統計顯著性較爲顯著。此結果爲〈假設一〉提供支持證據。其次，在將各 ODA 變項納入各模型後，其政治風險變項的統計顯著性明顯降低，代表日本企業對受援國的政治風險考量受到 ODA 變項而變得較不顯著，此爲〈假設二〉提供支持。

就控制變項而言，經濟規模變項對日本外資流入受援國，除模型一 B 爲 0.05 統計顯著性外，其他跨越各模型皆爲具 0.01 高度統計顯著性的正面效果。換言之，受援國的經濟規模越大，越容易吸引日本外資的流入。就經濟成長變項而言，統計結果顯示該變項對日本外資流入皆一致具有統計顯著性的正面相關。因此，受援國的經濟成長也是促進日本外資流入的重要因素。

就經濟發展程度變項而言，該變項與日本外資流入亦呈現正相關，但統計顯著性在不同模型中而有差異。就經濟開放程度變項而言，該變項與日本外資流入有正向關聯，且跨越各模型皆具有統計顯著性，顯示受援國的貿易開放程度對日本外資流入有鼓勵效果。就匯率變項而言，該變項雖然與外資流入呈現正相關，但該變項跨越各模型無一是具有統計顯著性，因此受援國的匯率並非日本外資流入的決定因素。

最後就受援國的政治制度變項而言，統計結果顯示，除模型二 AB 與模型四 A 爲正相關外，該民主變項與日本外資流入皆呈現負相關，但皆一致地不具統計顯著性。此結果顯示受援國政治制度的民主與否並不對日本企業向受援國投資具有統計顯著性的影響，這也意謂即使在日本戰略援助考量下，受援國的政治制度並未明顯成爲影響日本企業海外投資地點的因素。

綜合上述實證分析，以下幾點對日本 ODA 政策的實踐值得特別注意。

首先、無論何種形式，日本 ODA 援助普遍對日本企業對受援國的投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資有鼓勵效果。儘管日本自 1992 年頒布 ODA 大綱後逐漸脫離過去的「開發援助」傾向，但實證分析結果顯示，不論何種形式的日本 ODA 仍具有帶動日本企業對受援國投資的統計顯著性效果。換言之，日本外援與日本企業海外投資的正向關聯，仍是跨越日本 ODA 政策不同時期的一項持續至今的共同特徵。

其次，就不同形式的 ODA 與日本企業對受援國投資的關係而言，技術合作促進外資流入的關係最爲顯著，其次是貸款和贈與。此結果與先前闡述日本自 1980 年代逐漸降低有利於日本廠商的綁約性日圓貸款的趨勢相符，但卻也顯示即便在減少綁約性日圓貸款下，貸款仍相當程度持續地鼓勵日本企業對受援國的投資。這似乎支持日本 ODA 決策與執行機制是制度性地有利於日本企業對 ODA 的參與，因而持續帶動日本外資對受援國的投資。此外，技術合作與外資流入的高度關聯性，顯示日本在進入 ODA 大綱時期後，透過更爲細膩、隱蔽的技術合作援助方式，在協助受援國的同時而一方面促進日本企業對受援國的資本與技術輸出及日系人才訓練，因而有助於日本企業對受援國的市場佔領，進而提升日本企業對受援國的投資意願。最後，贈與對於日本外資流入的重要性相對較低，反映日本在後期 ODA 政策上更願意接受以受援國政府立場爲主，而不設贈與使用條件的人道援助理念。

第三，就政治風險而言，本研究發現日本企業對受援國的政治風險有著較高的接受度，此與既有一般印象多認爲地主國的高政治風險會阻卻外國企業向其投資的看法不同，本研究顯示，在不考慮 ODA 的情況下，受援國的政治風險變項與日本企業對受援國的投資呈現統計意義的負面關聯。這代表受援國的政治風險越低，卻越不易吸引日本企業對其投資。反倒是受援國的政治風險越高，卻愈容易吸引日本企業對其投資。該結果顯示日本企業似乎有著不畏懼受援國較不穩定的高政治風險環境，而傾向對這些有著較高政治風險的受援國進行投資的特性。

然而，對此結果的詮釋必須謹慎，以避免誤解。若是觀察將本研究所納入統計分析的受援國，可知多數的受援國大都是政經環境不佳，且有著較高政治風險的發展中國家。因此，在本研究中所獲得之日本企業有著對高政治風險的受援國進行投資之結果，不能被擴大解釋爲日本企業在全球

臺灣大學圖書館

範圍的海外投資上有著接受較高政治風險地主國的普遍傾向。這是因爲本文分析的結果是建基在數量有限的發展中國家上，而未包含日本企業有著更多投資的已開發國家。因此，對前述研究結果較合理的詮釋應是，具有高政治風險的受援國並非是阻卻日本企業前往投資的重要因素。

最後，就 ODA 與政治風險的關聯而言，前述分析顯示，ODA 有助於降低日本企業投資受援國的政治風險考量。此是指 ODA 有助於日本企業在進行海外投資決策時，對受援國之政治風險因素的思考比重，而不論受援國是高政治風險或低政治風險。換言之，日本企業在得知潛在投資地主國是日本 ODA 的受援國後，即可能減少對該受援國的政治風險因素在其投資決定中的比重。此原因可能是因前述之 ODA 代表著可信訊息或先導效應等，導致日本企業可以更放心地對受援國投資，進而減少受援國的政治風險因素在其投資決策的比重。由此觀之，日本 ODA 的確有著降低日本企業對受援國政治風險考量的效應，進而達成促進日本企業對受援國的投資效果。

三、有關變項與模型的測試

本文採用取 Beck 與 Katz 的追蹤資料校正標準差（PCSE）之最小平方分析（OLS）進行統計分析的理由，主要爲處理有著異質性（heteroscedasticity）及同時空間相關（contemporaneous spatial correlation）的資料時而採用的統計分析方式。該方式較一般使用的固定效果（fixed effect）或隨機效果（random effect）更爲適合使用在檢測此種特性的資料上。[8] 相較於其他統計方式，筆者認爲本文採取的分析方式更爲滿足下列三項的要求：(1) 統計資料的特性；(2) 是否能減少誤差；(3) 是否能夠正確檢證假設。

其次，有關於各 ODA 變項與政治風險變項的關聯是否存在線性重合的可能。筆者個別針對 ODA 的貸款、贈與及技術合作與政治風險的關係，進行相關性檢測後，發現政治風險變項（評分高表示該地主國較安全）與貸

[8] Hausman 測試檢定的目的在測試個體效果與解釋變項是否存在相關，進而作爲是否採用固定效果或隨機效果的依據，但本文是採用 PCSE 進行分析，因此無須採取 Hausman 測試檢定。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款、贈與及技術合作的相關性分別是 -0.21、-0.36 及 -0.11。因此，政治風險變項並未與 ODA 變項呈現相關的現象。再者，筆者亦從包含政治風險變項與 ODA 相關變項的 OLS 線性模型中，利用 VIF 來檢測這些變項是否有共線性（Multi-Collinearity）問題，檢測結果顯示每個模型所得的平均 VIF 數值皆皆小於 4，顯見並沒有線性重合問題。

最後，有關政治風險變項是否與 ODA 變項是交乘的關聯，筆者透過建立政治風險與各個 ODA 變項的交乘變項（interactive variables）來檢視其關聯。統計結果亦發現在各模型中的交乘變項均不具統計顯著性，因此沒有證據顯示政治風險變項是與 ODA 變項是交乘的關聯。

伍、結論

政府對外援助作爲日本政府的一項重要外交工具，向來是學界關注的焦點與研究的對象。在過去日本作爲發展型國家典範下，日本政府使用 ODA 來幫助日本企業向海外拓展市場及確保物資能源的方式，成爲國家與企業合作的良好範例。換言之，日本政府一方面透過 ODA 的援助來達成外交目的，另一方面則透過該援助轉而促進日本企業對受援助國輸出日本商品、技術及投資，以達成其經濟目的。

因此，日本 ODA 不僅是日本政府的外交工具，亦是疏通日本經濟向海外拓殖的手段。依照發展型國家邏輯與 ODA 作爲國家對外政經手段的國家發展模式，日本企業的海外投資方向自然與日本政府的 ODA 政策應呈現高度相關，也即是日本政府對受援國的 ODA 援助對日本企業向受援國的投資應有正面的鼓勵效果。

鑑於當前學界對日本 ODA 的探討多屬於對 ODA 政策演變的分析，或是 ODA 在日本外交上對相關國家之雙邊關係的影響，但對於 ODA 是否會影響日本企業海外投資地點選擇的研究，卻相對鮮少，更缺乏從 ODA 是否會減少日本企業對受援國之政治風險考量的角度之研究。爲彌補當前探討之不足，本文從企業對外投資的政治風險考量出發，並深入分析日本援外政策的變遷與特徵，提出 ODA 與企業思考政治風險的理論關聯，進而提出日本 ODA 有助於日本企業前往受援國投資及 ODA 有助於減少日本企

臺灣大學圖書館博碩士論文資料庫

業對受援國之政治風險考量的兩項假設。

本文指出日本 ODA 代表正面訊號、具有先導效應及具備結構性有利於日本企業的制度性因素的三點理論解釋來支持前述兩項假設，並進行統計實證分析。統計結果顯示，日本 ODA 無論是何種形式，皆對日本企業前往受援國投資具有正面效果，其中尤以技術合作項目與日本外資流入的統計顯著性較爲突出，其次則爲貸款及無償贈與。此結果顯示即便在日本進入 ODA 大綱時期及最近的開發合作大綱時期，日本 ODA 與日本企業對外投資的緊密關聯是一個持續的現象。

其次，本文也發現具高度政治風險的受援國並未成爲阻卻日本企業前往投資的因素，反而日本企業在對受援國的投資上卻是呈現接受政治風險的特性。此點與既有印象普遍認爲政治風險將抑制外資流入的結果不同。但若考量到日本 ODA 受援國原本即多是政治風險較高的發展中國家，則可理解此項發現並不代表日本企業普遍在海外投資上具有接受高政治風險地主國的傾向。最後，本文也發現 ODA 因素有助於降低日本企業對受援國的政治風險考量。此結果顯示，對日本企業而言，獲得 ODA 援助的國家代表日本政府釋出某種程度的保證，而可讓日本企業減少在對這些國家投資時評估其政治風險的比重，進而達到間接鼓勵日本企業對這些受援國投資的效果。

總之，本文透過對日本外援政策的質性探討與量化實證分析，證實日本 ODA 政策即使在進入後冷戰時期仍與日本企業的海外投資有著緊密關聯。日本 ODA 對於日本企業在前往受援國投資決策上，除可降低日本企業對受援國的政治風險思考，並透過其 ODA 政策與執行的結構性因素，而有鼓勵日本企業前往受援國投資的正面積極效果。此發現也證明，儘管日本援外政策與理念隨時代而改變，但其以對外援助來達成其國家經濟利益的隱蔽原則仍跨越不同時期而持續一致。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石原忠浩，1998，〈日本「政府開發援助政策」之研究：以對中共的援助爲例〉，《問題與研究》，37(10): 53-70。Ishihara, Tadahiro. 1998. “Riben「zhengfu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kaifa yuanzhu zhengce」zhi yanjiu: yi dui zhonggong de yuanzhu weili" [Japan's Economic Assistance Policy to Mainland China]. *Issues & Studies* 37(10): 53-70.

石原忠浩，2015，〈日本對外援助政策的指導方針：開發合作大綱的制定與展望〉，《新社會政策雙月刊》，42: 31-36。Ishihara, Tadahiro. 1998. "Riben duiwai yuanzhu zhengce de zhidao fangzhen: kaifahezuo dagang de zhiding yu zhanwang" [Guideline of Japan's Foreign Aid Policy: the Formation and Prospects of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Charter]. *New Soceity for Taiwan* 42: 31-36.

吳佩殊，2006，〈日本對東南亞各國 ODA 實施概況〉，《亞太研究通訊》，4: 110-133。Wu, Peishu. 2006. "Overviwe of Japan's ODA Practices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Riben dui dongnanya geguo ODA shishi gaikuang]. *Newsletter of the Asia-Pacific Research* 4: 110-133.

李世暉，2016，《日本國家安全的經濟視角：經濟安全保障的觀點》，臺北：五南。Li, Shih-hui. 2016. *Riben guojiaanquan de jingjishijiao: jingjianquan baozhang de guandian* [*Economic Perspective of Japan's National Security: Economic Security Viewpoint*]. Taipei: Wunan.

邱奕宏，2017，〈軍事衝突在商業政治風險分析中的考量〉，湯智貿（編），《和平與衝突研究：理論新視野》：臺北：五南，頁 83-112。Chiou, Yi-hung. 2017. "Junshi chongtu zai shangye zhengzhi fengxian fenxi zhong de kaoliang" [The Factor of Military Conflict in the Business Analysis of Political Risk]. In *Heping yu chongtu yanjiu：lilun xin shiye* [*Peace and Conflict Research: New Theoretical Prospects*], ed.Tang, Zhi-mao. Taipei: Wunan, 83-112.

柯玉枝，2000，〈日本對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外交：從「內向經濟」至「政經並行」〉，《問題與研究》，39(5): 71-88。Ko, Yu-chih. 2000. "Riben dui dongnanya guojia de jingjiwaijiao: cong「neixiang jingji」zhi「zhengjing binghang」" [The Southeast Asian Policy of Contemporary Japan]. *Issues & Studies* 39(5): 77-88.

柯玉枝，2001，〈當前日本對外援助政策分析〉，《問題與研究》，40(6): 31-51。Ko, Yu-chih. 2001. "Dangqian riben duiwaiyuanzhu zhengce fenxi" [The Southeast Asian Policy of Contemporary Japan]. *Issues & Studies* 40(6): 31-51.

張隆義，1983，〈日本與東南亞的關係〉，《問題與研究》，22(5): 40-41。Chang, Rong-yi. 1983. "Riben yu dongnanya de guanxi" [Japan-Southeast Asian Relations]. *Issues & Studies* 22(5): 40-41.

臺灣大學圖書館

彭　云，2009，〈試析日本的援助理念〉，《外交評論》，2: 94-104。Peng, yun. 2009. “Shixi riben de yuanzhu linian” [Analysis of Japan’s Foreign Aid Idea]. *Waijiao Pinglun* 2: 94-104.

蔡東杰，2010，〈日本援外政策發展：背景、沿革與演進〉，《全球政治評論》，32: 33-48。Tsai, Tung-Chieh. 2010. “Riben yuanwai zhengce fazhan: beijing、yange yu yanjin” [Development of Japan’s Foreign Aid: Background, Content and Evolution]. *Review of Global Politics* 32: 33-48.

二、日文部分

外務省，2015，〈開発協力大綱〉，日本外務省網頁，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eisaku/taikou_201502.html，2020/10/15。

外務省，2016，〈日本の安全保障政策　積極的平和主義〉，日本外務省網頁，https://www.mofa.go.jp/mofaj/p_pd/dpr/page1w_000072.html，2020/7/1。

外務省，2020a，〈2019 年版開発協力白書：日本の国際協力〉，日本外務省網頁，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press/shiryo/page25_000299.html，2020/4/30。

外務省，2020b，〈政府開発援助（ODA）国別データ集〉，日本外務網頁，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kuni.html，2020/10/15。

金熙徳，2002，《徹底検証!日本型 ODA：非軍事外交の試契》，東京：三和書籍。

小浜裕久，2013，《ODA の経済学（第 3 版）》，東京都：日本評論社。

小林英夫，1985，《戦後日本資本主義と東アジア経済圏》，東京：御茶の水書坊。

西垣昭，下村恭民，辻一人，2009，《開発援助の経済学：「共生の世界」と日本の ODA》，東京都：有斐閣。

渡辺利夫，2007，《ODA（政府開発援助）：日本に何ができるか》，東京：中央公論新社。

独立行政法人国際協力機構，2019，〈国際協力機構　年次報告書 2019〉，国際協力機構網頁，https://www.jica.go.jp/about/report/2019/index.html，2020/4/30。

独立行政法人国際協力機構，2020a，〈ODA と JICA〉，国際協力機構網頁，https://www.jica.go.jp/aboutoda/jica/index.html，2020/10/15。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独立行政法人国際協力機構，2020b，〈事業ごとの取り組絜〉，国際協力機構網頁，https://www.jica.go.jp/activities/schemes/index.html，2020/10/15。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2020，〈統計ナビ〉，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網頁，https://www.jetro.go.jp/world/statistics/，2020/10/15。

三、英文部分

Akaha, T. 1991. “Japan’s Comprehensive Security Policy: A New East Asian Environment.” *Asian Survey* 31(4): 324-340.

Alesina, A. & D. Dollar. 2000. “Who Gives Foreign Aid to Whom and Why?”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5(March): 33-63.

Arase, D. 1994. “Public-Private Sector Interest Coordination in Japan’s ODA.” *Pacific Affairs* 67(2):171-199.

Beck, N. & J. Katz. 1995. “What to Do (and Not to Do) with Time-Series-Cross-Sectional Data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9: 634-647.

Beck, N. & J. Katz. 2011. “Modeling Dynamics in Time-Series-Cross-Section Political Economy Data.”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4: 331-352.

Biglaiser, G. & J. L. Staats. 2010. “Do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ffect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Survey of U.S. Corporations in Latin America.”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63(3): 508-522.

Blaise, S. 2005. “On the Link between Japanesse ODA and FDI in China: A Microeconomic Evaluation Using Conditional Logit Analysis.” *Applied Economics* 37: 51-55.

Blaise, S. 2009. “Japanese Aid as a Prerequisite for FDI : The Case of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Finance Working Papers 22767).” in http://www.eabe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AJRC_Blaise_2010.pdf. Latest update 30 April 2020.

Brooks, W. L. & M. Orr, J. Robert. 1985. “Japan’s Foreign Economic Assistance.” *Asian Survey* 25(3): 322-340.

Bueno de Mesquita, B. & A.Smith. 2007. “Foreign Aid and Policy Concession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1(2): 251-284.

Busse, M. & C. Hefeker. 2007. “Political Risk, Institution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3(2): 397-415.

Buthe, T. & H. V. Milner. 2009.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Political Analysis”. In *The Effect of Treaties on Foreign*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Direct Investment: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Double Taxation Treaties, and Investment Flows, eds. Karl. P. Sauvant & Lisa E. Sach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71-224.

Chakrabarti, A. 2001. "The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ensitivity Analyses of Cross-Country Regressions." *KYKLOS* 54(1): 89-114.

Clark, D. P. 1991. "Trade verse Aid: Distributions of Third World Development Assista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39(4): 829-837.

Doyle, M. W. 1986.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4): 1151-1169.

Fujisaki, T., F. Briscoe, J. Maxwell, M. Kishi, & T.Suzuki. 1996. "Japan as Top Donor: The Challenge of Implementing Software Aid Policy." *Pacific Affairs* 69(4): 519-539.

Gartzke, E., Q. Li, & C. Boehmer. 2001. "Investing in the Peace: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5(2): 391-438.

Gilpin, R. 1975. *U. 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Gilson, J. 2007. "Building Peace or Following the Leader? Japan's Peace Consolidation Diplomacy." *Pacific Affairs* 80(1): 27-47.

Gowa, J. S. 1994. *Allies, Adversari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arms, P. & M. Lutz. 2003. "Aid, Governance, and Private Foreign Investment: Some Puzzling Findings for the 1990s." *Economic Journal* 116(July): 773-790.

Hirata, K. 1998. "New Challenges to Japan's Aid: An Analysis of Aid Policy-Making." *Pacific Affairs* 71(3): 311-334.

Hirschman, A. O. 1977.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ook, S. W. & G. Zhang. 1998. "Japan's Aid Policy since the Cold War: Rhetoric and Reality." *Asian Survey* 38(11): 1051-1066.

Ichimura, S. 1980. "Japan and Southeast Asia." *Asian Survey* 20(7): 754-762.

Jensen, N. M. 2008. "Political Risk,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ournal of Politics* 70(4): 1040-1052.

Jensen, N. M. 2003.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Political Regimes and Inflow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7(3): 587-6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Jensen, N. M. 2006. *Nations-States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A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Jensen, N. M., ed. 2012. *Politic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n Arbor: The Univesity of Michigan Press.

Johnson, C. 1982.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Jones, G. 1996.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Karakaplan, U., B. Neyapti, & S. Selin. 2005. "Aid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Evidence." in https://www.econstor.eu/handle/10419/83262. Latest update 30 April 2020.

Katada, S. N. 2002. "Japan's Two-Track Aid Approach: The Forces behind Competing Triads." *Asian Survey* 42(2): 320-342.

Kennedy, C. R. 1987. *Political Risk Management*.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Inc.

Keohane, R. & J. Nye. 2001.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3rd ed. New York: Longman.

Kester, W. C. 1993. *Japanese Takeovers: The Global Contest for Corporate Control*. Washington, D.C.: BeardBooks.

Kimura, H. & Y. Todo. 2010. "Is Foreign Aid a Vanguard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Gravity-Equation Approach." *World Developmen*t 38(4): 482-497.

Knack, S. 2004. "Does Foreign Aid Promote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8(1): 251-266.

Kobrin, S. J. 1979. "Political Risk: A Review and Reconsider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0(1): 67-80.

Kojima, K. 2000. "The 'Flying Geese' Model of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Origin, Theoretical Extensions, and Regional Policy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11(4): 375-410.

Koyama, N. 2018. "Does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Promot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Japan and China." *Tamka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2(1): 39-68.

Koyama, N. & E. Jen. 2015. "Does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Promot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minar in Tamkang University, December 18, Tamkang University, New Taipei City, Taiwan.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Krasner, S. D. 1978. *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Raw Materials Investments and U. S.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i, Q. 2009. “Democracy, Autocracy, and Expropri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2(8): 1098-1127.

Long, A. G. & B. A. Leeds. 2006. “Trading for Security: Military Alliances and Economic Agreement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3(4): 433-451.

Long, W. J. 1999. “Nonproliferation as A Goal of Japanese Foreign Assistance.” *Asian Survey* 39(2): 328-347.

Mandel, R. 1984. “The 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Spring: 89-95.

Marshall, M. G. & K. Jaggers. 2005. “Polity IV Project: Political Regime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itions, 1800-2004.” in http://www.cidcm.umd.edu//polity. Latest update 30 April 2020.

Moundigbaye, M., W. S. Rea, & W. R. Reed. 2017. “Which Panel Data Estimator Should I Use? A Corrigendum and Extension (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 No. 2017-2058)”. in http://www.economics-ejournal.org/economics/discussionpapers/2017-58/file. Latest update 30 April 2020.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 2011. *2010 World Investment and Political Risk*.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Group.

OECD. 2004. “Trends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erspective 2004*, ed. OECD. Paris: OECD, 9-30.

OECD. 2020a.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DAC).” in http://www.oecd.org/dac/dacmembers.htm. Latest update 15 October 2020.

OECD. 2020b.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definition and Coverage.” in http://www.oecd.org/development/financing-sustainable-development/development-finance-standards/officialdevelopmentassistancedefinitionandcoverage.htm. Latest update 15 October 2020.

Oneal, J. R., F. H. Oneal, Z. Maoz, & B. M. Russett. 1996. “The Liberal Peace: Interdependence, Democracy,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1950-1985.”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3(1): 11-28.

Polachek, S., C. Seiglie, & J. Xiang. 2007. “The Impa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 18(5): 415-429.

Remmer, K. L. 2004. “Does Foreign Aid Promote the Expansion of Govern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8(1): 77-92.

臺灣大學期刊資料庫

Rosecrance, R. & P. Thompson. 2003. “Trade, Foreign Investment, and Securit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6: 377-398.

Russett, B. & J. R. Oneal. 2001. *Triangulating Peace: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Selaya, P. & E. R. Sunesen. 2012. “Does Foreign Aid Increa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orld Development* 40(11): 2155-2176.

Simon, J. D. 1982. “Political Risk Assessment: Past Trends ad Future Prospects.” *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17(3): 62-70.

The PRS Group. 2020. “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 Methodology.” in https://www.prsgroup.com/wp-content/uploads/2012/11/icrgmethodology.pdf. Latest update 15 October 2020.

Tuman, J. P., C. F. Emmert, & R. E. Sterken. 2001. “Explaining Japanese Aid Policy in Latin America: A Test of Competing Theorie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54(1): 87-101.

Wile, Rob. 2014. “The True Story Of The 1980s, When Everyone Was Convinced Japan Would Buy America (Business Insider. Sep. 6).” in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japans-eighties-america-buying-spree-2014-9. Latest update 30 April 20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 錄

各變項的定義及資料來源

名　　稱	定　　義	範　　圍	資 料 來 源
日本對外直接投資	以日本企業對受援國年度直接投資金額的自然對數（natural log）作為變項。	1983-2018 年的 32 個國家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
日本政府發展援助（ODA）	日本對受援國的援助，分為三種：貸款、無償贈與及技術合作，以各項金額的自然對數作為變項。	1969-2017 年包括全球 170 多個國家及地區	日本外務省網站的 ODA「國別開發合作實績」
政治風險	「政治風險服務集團」（PRS）中「國際間國家風險指引」的各國政治風險指標作為變項，從 0 至 100。該變項的數值越高表示該國的政治風險越低、越安全。	1984-2020 年共 146 個國家	政治風險服務集團（PRS）
市場規模	受援國的國內生產毛額對數值來代表市場規模。	1960-2019 年的 264 個國家、地區及組織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DI)，世界銀行
經濟成長	受援國的 GDP 年成長率。	1960-2019 年的 264 個國家、地區及組織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DI)，世界銀行
經濟發展	受援國人均 GDP（per capita GDP）的對數值。	1960-2019 年的 264 個國家、地區及組織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DI)，世界銀行
經濟開放度	受援國的貿易量占該國 GDP 的比重。	1960-2019 年的 264 個國家、地區及組織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DI)，世界銀行
匯率	受援國的貨幣對美元在該年度的平均匯率	1948-2020 年的世界各國與地區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國際貨幣基金
民主	受援國的民主程度，從不民主的 -10 分到最民主的 10 分。	1800-2018 年	Polity IV
前一年外資流入	前一年外資流入的對數值。	1983-2017 年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表 1　日本 ODA 與政治風險對日本企業對外投資之影響（不含匯率變項）

模型 / 變項	基線模型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A	B	A	B	A	B	A	B	A	B
外資 (t-1)	.5709*** (.0731)	.5274*** (.0984)	.5022*** (.0990)	.5159*** (.0868)	.5021*** (.0862)	.5645*** (.0748)	.5423*** (.0743)	.5587*** (.0769)	.5394*** (.0765)	.5380*** (.0799)	.5171*** (.0793)
貸款 (t-1)		.1371** (.0637)	.1229** (.0621)								
贈與 (t-1)				.1205** (.0583)	.1021* (.0591)						
技術合作 (t-1)					.	.1634*** (.0573)	.1495*** (.0561)				
贈與&技術合作 (t-1)								.1756*** (.0657)	.1584** (.0644)		
ODA (t-1)										.1524** (.0609)	.1415** (.0611)
政治風險 (t-1)	-.0228** (.0108)		-.0209* (.0115)		-.0162 (.0115)		-.0194* (.0107)		-.0182* (.0107)		-.0195* (.0106)
經濟規模 (t-1)	.2986*** (.0822)	.3184*** (.1147)	.2956*** (.1134)	.5274*** (.1163)	.4903*** (.1194)	.4114*** (.0913)	.3838*** (.0915)	.4258*** (.0958)	.3967*** (.0962)	.3226*** (.0794)	.3024*** (.0793)
經濟成長 (t-1)	.0535* (.0233)	.0552** (.0247)	.0716** (.0290)	.0495** (.0231)	.0625** (.0274)	.0372* (.0215)	.0494** (.0237)	.0348 (.0216)	.0465* (.0239)	.0349 (.0215)	.0472** (.0237)
經濟發展 (t-1)	.1058 (.0965)	.2887** (.1319)	.3585*** (.1373)	.1495 (.0929)	.1990** (.0994)	.1060 (.0895)	.1800* (.0975)	.1239 (.0886)	.1895** (.0964)	.2669** (.1204)	.3313*** (.1238)
經濟開放度(t-1)	.0037*** (.0012)	.0038* (.0022)	.0042* (.0022)	.0090*** (.0023)	.0089*** (.0022)	.0042*** (.0013)	.0046*** (.0013)	.0045*** (.0014)	.0048*** (.0014)	.0032*** (.0012)	.0037*** (.0012)
民主 (t-1)	-.0046 (.0086)	-.0051 (.0086)	-.0059 (.0088)	.0096 (.0085)	.0074 (.0086)	-.0053 (.0084)	-.0069 (.0085)	-.0026 (.0082)	-.0044 (.0083)	-.0075 (.0091)	-.0090 (.0092)
常數	-5.0457 (1.8650)	-8.8970 (2.6403)	-7.4460 (2.7096)	-13.3497 (3.0053)	-11.6263 (3.2134)	-10.0492 (2.2691)	-8.5335 (2.3674)	-10.6615 (2.4754)	-9.1122 (2.5684)	-8.9492 (2.0032)	-7.5554 (2.1076)
樣本數	230	187	187	210	210	230	230	229	220	230	230
R-SQUARE	0.61	0.61	0.62	0.63	0.63	0.62	0.63	0.62	0.63	0.63	0.63

註：括號內為標準差。P-values 以單尾檢定。*$p \leq .10$, **$p \leq .05$, ***$p \leq .01$。
資料來源：筆者依本研究結果製表

The Nexus between Foreign Aid and FDI: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Impact of Japan's ODA on Japanese Firms' Overseas Investments*

*Yi-hung Chiou***

Abstract

The goal of this article i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state's foreign aid and firms' outward investments, as well as the firms' political risk assessments regarding aid recipient states. Specifically, it examines whether Japan's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 affects Japanese firms' overseas investment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ODA, as an instrument of Japan's foreign policy, reduces Japanese firms' political risk concerns, while facilitating their investments in ODA recipient countries. Nevertheless, with changing ODA policies over time, whether the ODA-investment nexus remains valid is questionable. By illustrating the evolution of Japan's ODA policy, this article adopts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to exploring whether Japan's ODA affects Japanese firms' political risk assessment, so as to enhance investments in the aid recipient countries.

Keywords: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Political Risk,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Foreign Aid

* DOI:10.6166/TJPS.202009_(85).0003
**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E-mail: chiouyihung@nct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